

中印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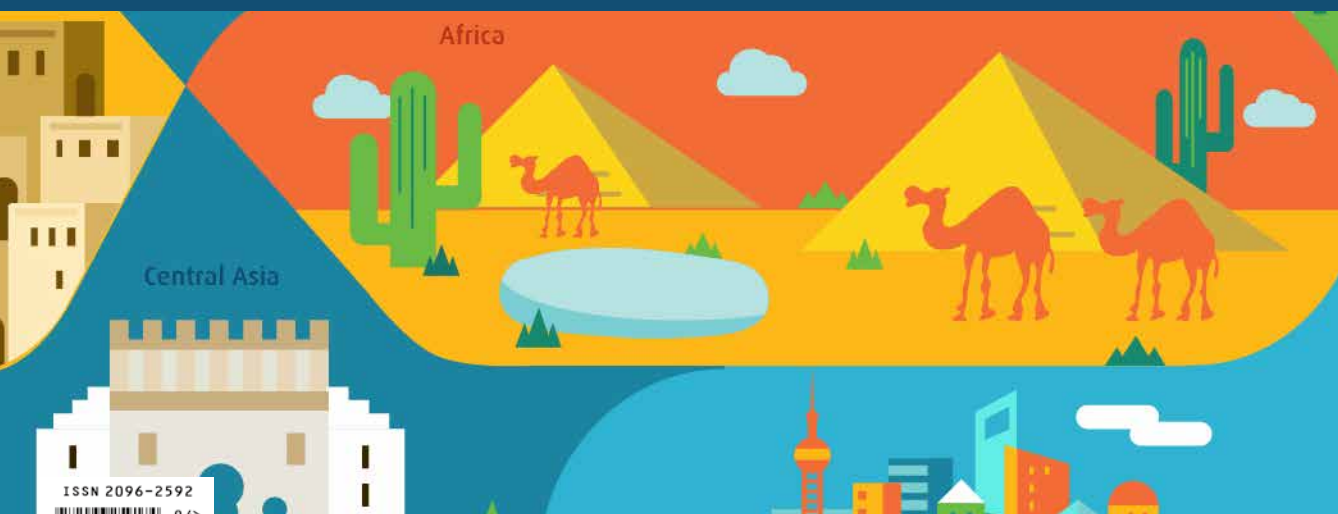
2017年第2期(总第4期)

p.14 以“一带一路”破解中印巴安全困局

p.20 中印要“对话”，不要“猜疑”



“一带一路” 与新型发展合作



ISSN 2096-2592



国内零售价：10元 / India ₹ 100

www.chinaindiadialogue.com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印度工业联合会



Partner India

携手印度

Subscribe to the future

共创辉煌



目录

大事记 / p.02

开篇辞 “一带一路”与新型发展合作 / p.04
印中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拦路虎” / p.08

评论 中印需要合作共赢 / p.10
印度面对“一带一路”的尴尬选择 / p.12

战 略

以“一带一路” 破解中印巴安全困局

14



访谈 中印要“对话”，不要“猜疑” / p.20

趋势 “蒸蒸日上”的印度 / p.24

案例 泛亚铁路网：“一带一路”南线通道的挑战 / p.26
包钢入印度记 / p.30
去印度建电站 / p.34

论辩 “印度制造”能否拥抱“一带一路” / p.38
“印度制造”如何吸引外国投资 / p.42

数据 “一带一路”三年进展图 / p.46

青年声音 我眼中的中国/印度电影 / p.52

专栏 印度人在中国 / p.56
茶歇时分 / p.60

阅读 印度的力量和弱点 / p.62

中印对话

主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主办：人民画报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箱：contact@chinaindialogue.com

社长：于涛
编委会：
于涛、李霞、贺鹏、王磊、于佳、闫颖
执行总编：李霞
编辑部主任：温志宏、乔振祺
翻译定稿：徐明强
语言顾问：

Scott Huntsman, Nicholas Lanigan

编辑、翻译：
王冬梅、王舒雅、刘海乐、许舒园、
张雪、李艺琦、李卓希、Mithila Phadke、
周昕、胡周萌、赵月、殷星、龚海莹
流程统筹：张雪
校对：徐欣
设计：Alinea Productions
网络运维与图表设计专员：
Andrey Maleev
邮购收款人：人民画报社出版发行部
法律顾问：岳成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刊号 ISSN 2096-2592
CN10-1432/D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第399信箱，
100048

电话：+86-10-68413849
+86-10-68412166

广告许可证号 京海工商广登字20170199号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中印对话》顾问委员会（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为公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顾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副总编辑

艾娜伽 (Alka Acharya)

印度中国研究所前所长

孙士海 原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原中国社会
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孙玉玺 前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
前中国驻印度大使

阮瑞山 (T. C. A. Rangachari)

印度辩喜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前印度驻外大使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
研究中心教授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杨漪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亚中心
印地语广播部主任

林民旺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研究员

胡仕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

塔伦·维杰 (Tarun Vijay)

印度议会印中友好小组主席
印度联邦院议员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中印对话

2017年第2期(总第4期)

www.chinaindialogue.com

中国老兵王琪终返故土

1963年，24岁的中国工程兵王琪在中印边界地区的树林中迷了路误入印境，被印度军方在监狱中关押7年。出狱数十年后几经周折，他终于同陕西家乡的亲人联系上，并于今年2月11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中国空军首次参加印度航展

2月14日至18日，第11届印度航展在印度班加罗尔耶拉汉卡空军基地举行。有媒体称，中国派出了一个5人空军代表团参加此次航展，但没有展示任何装备。



中印战略对话在京举行

2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印度外事秘书苏杰生在北京举行中印战略对话。双方一致认为，中印两国国情相似，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相近，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同意，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协调配合，并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傅莹谈中印关系

3月4日，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印度记者提问时，就中印关系发表看法。她认为，中印这些年一方面谈问题，一方面继续不断推进合作，所以才能走向今天这一步。她特别提到“一带一路”建设和互联互通项目，“都是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最终对印度也是有益有利的，所以看问题还是要从大的方面看。”



印巴将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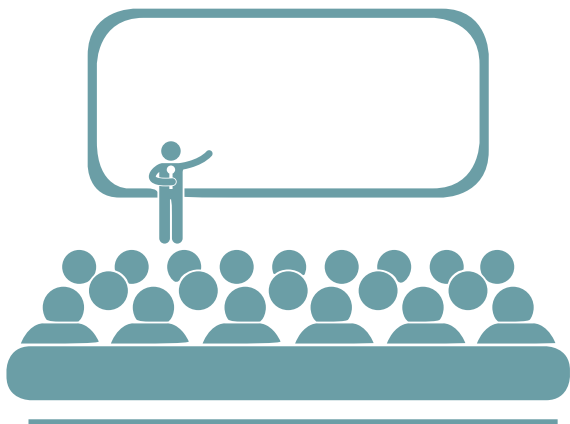
上合组织第十七次元首峰会将于今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本次峰会上，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成为上合组织第七个和第八个正式成员国。阿斯塔纳峰会后，中国将任主席国。

中印媒体论坛在新德里举办

3月10日，中印媒体论坛在新德里举办。《人民日报》、新华社、《文汇报》、凤凰卫视等中国驻印记者，《印度教徒报》、新德里电视台等媒体及智库人士20多人与会，就中印媒体传播现状、未来合作前景等进行讨论。

中印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

3月16日，中国新经济出海峰会暨第二届中印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小米、阿里巴巴、Instamojo、Tripoto、Blume风投等知名中印企业团队共同探讨了两国新经济创业等话题。



OPPO打造印度工业园区

OPPO将投资 2.16 亿美元在印度北方邦诺伊达市建立一个新工业园，目标年产1亿部。据悉，多家中国手机厂商已在印度设厂。中国手机在印度十分畅销，据2016年第四季度数据，中国手机品牌占了印度市场份额的46%。

中印智慧城镇化大会与博览会召开

“中印智慧城镇化大会与博览会”于3月15日至17日在新德里举办。展会邀请到中印两国产业、政府和学术界代表出席，就印度100个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计划进行了交流。

《功夫瑜伽》在印度放映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和印度新闻广播部电影委员会于3月16日在新德里联合举办电影《功夫瑜伽》的放映活动。《功夫瑜伽》是由中印影星合拍的功夫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位考古学家在中印两国间寻找“神秘宝石”的冒险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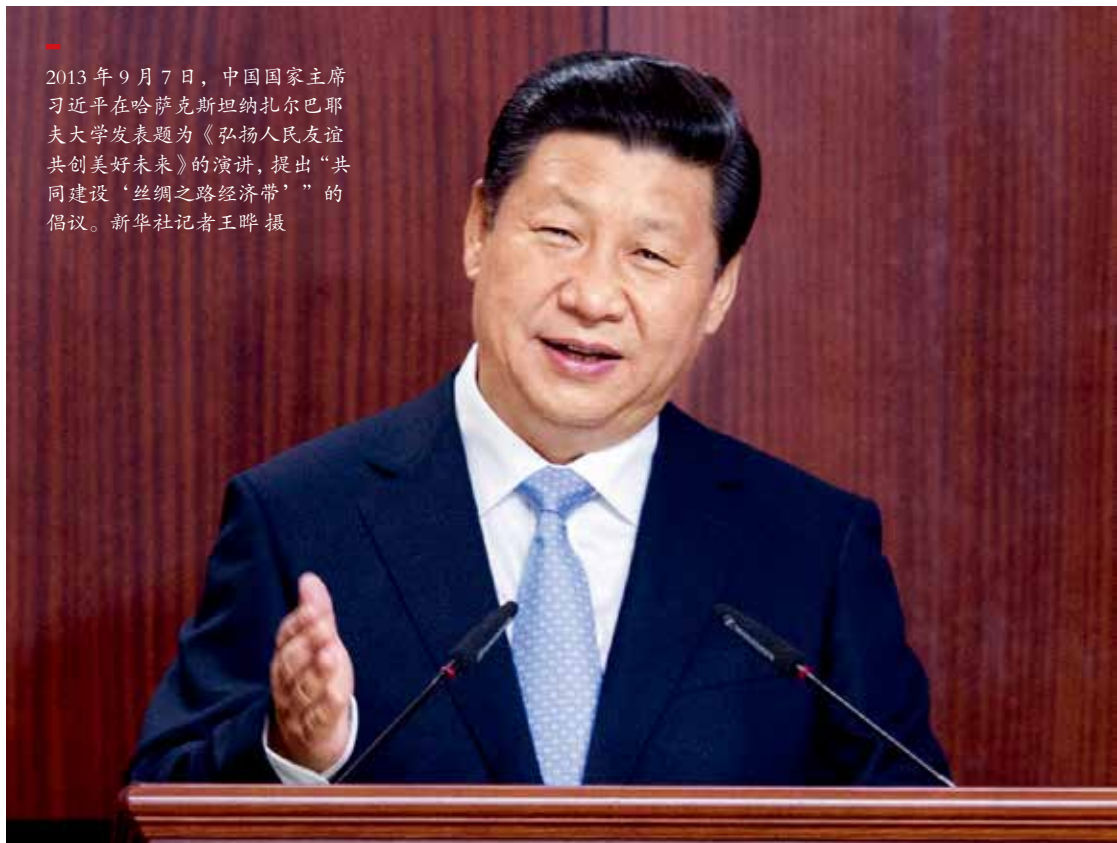
“中印友好与文明互鉴圆桌会议”在新德里举行

4月7日，第二轮“中印友好与文明互鉴圆桌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印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多元文化和社会治理、区域安全问题、中印经贸发展、双方民间交往及媒体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首轮“中印友好与文明互鉴圆桌会议”于2015年11月在北京举行。

新开发银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4月1日，新开发银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新开发银行各成员国理事和代表，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出席。财政部部长肖捷作为新开发银行中国理事出席会议。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会议原则通过了总体战略（2017-2021年），并原则同意启动吸收新成员程序。会议选举肖捷为第三届理事会主席，并决定第三届理事会年会将于2018年3月在中国上海举行。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新华社记者王晔 摄



“一带一路” 与新型发展合作

文 / 张蕴岭

中国基于开放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推动构建一个合作与和平的地区与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大的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提出了新的发展合作理念，为大家所接受；二是因为见之于行动，不是空谈，有了看得见的成效。如今，“一带一路”不

仅仅是一种区域合作倡议，更是一种扩及世界的广义合作理念与平台。

打破中国西部的地缘制约

“一带一路”是通过陆、海网络把亚洲、欧洲和非洲广

大地区连接起来，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建设、港口经济区和港口物流网建设为重点，实现大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促进投资、商品、服务、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便利化流动，以此创建新的发展动能。

中国提出倡议，首要的战略考虑是为经济的转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优势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劳动力流向那里。相比之下，西部发展缺乏活力，国内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加剧，而区域发展失衡反过来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一直为纠正失衡做出努力，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本世纪初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此战略涵盖12个省、区、市，中央政府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电力和天然气项目等）提供大力支持，并以优惠政策鼓励东部资源向西部流动。但数年之后，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没有显著降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部受到地缘“内部制约”。

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国内导向相比，“一带一路”强调西部发展的向内和向外发展战略相结合，让西部有了更为开放的市场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希望通过陆地网络把中国-中亚-西亚-俄罗斯-欧洲以及中国-东南亚-南亚连接起来，建设开放的新发展带；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把中国-东南亚-印度洋-非洲-欧洲以及中国-大洋洲通过海上网络连接起来，构建跨海合作区，实现共同发展。将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相连接，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空间，不仅为中国

的西部地区拓展出新的延伸带，而且也整个中国提供了新发展合作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处在一个新的调整期，需要新思路和新倡议。“一带一路”提出依靠创新推动合作发展，通过学习经验、分享资源和共享利益来建构新的综合发展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实现包容与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这是当下世界诸多新思路中最有影响力的倡议之一。

催生亚欧非大市场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为：1. 政策协调，通过协调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计划和措施，为合作伙伴的实施方案提供政策支持；2. 通

“‘一带一路’建设将逐步完善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互联互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网络，从而催生一个巨大的亚欧非大市场。”

过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包括建设计划和技术标准系统的整合；3. 通过改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促进贸易和投资，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4. 通过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金融合作、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信息系统，实现货币互换结算，发展债券市场，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5. 通过促进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人员交流与合作、媒体合

作、青年和女性的交流和志愿服务，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将作为倡导者和主要参与者，为上述实践提供关键的资本投入和技术支持。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互联互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法规、规则和标准一致或者连接，以及人员流动与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建立现代化的交通网络。法规、规则与标准的一致重点在实现便利化，取消或者大幅度减少交通运输、贸易和投资的限制。人员流通便利重点在于为工程技术或商务人员出行，教育、文化人员交流和公民旅行提供方便。中国在建设基础设施网络方面积累了管理经验，同时拥有设备技术能

力，因此可以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投资和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旨在通过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在沿线国家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将有助于扩大贸易和投资，提高贸易和投资结构，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立工业区、港口网络、发展筹资以及能力建设等创造新的发展领域。

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支撑。金融合作涵盖了广泛的跨境金融议程，其中包括货币稳定、项目融资、双边货币互换、结算、债券市场、人民币计价债券等。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以及中国-东盟银行间协会和上合组织银行间协会等都将发挥各自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建立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提高风险应对和危机管控能力，建立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创建交流与合作的机制以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通过这些协同努力，有助于促进货币的稳定，增强信用体系的能力，鼓励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民间资金参与重点项目的建设。

民心相通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共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包括经济议程，也包括文化、学术交流、培训、媒体合作、青年和女性交往，从而“赢得公众对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支持，在各种合作机制下，促进人才交流、旅游、体育交流、疫情信息共享、预防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培训交流，提高科学和技术合作，以及对青年就业、创业培训实践合作、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城市之间的合作。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多样性，“一带一路”不可能制定与实行单一的规划，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将与东道国的发展规划对接，实现双赢，让各方从参与中收益。现实中，“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

不高，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本国的发展融入到大区域的合作网络中，就有利于突破本国能力的限制、跨国链接的限制，以及物流网络的限制。

因此，从未来发展的前景看，“一带一路”建设将逐步完善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互联互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网络，为发展新工业区、金融中心、自由贸易和投资区，以及其他综合项目（如油气管道、电网、互联网络、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等）提供新的环境，这将会催生一个巨大的亚欧非大市场。

“开放的区域主义”

不同于传统的开发援助，“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参与方均为平等的伙伴。从地缘范围看，“一带一路”建设覆盖了60多个国家的广大地区，它需要所有相关合作伙伴的积极参与和密切合作，并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在满足所有参与者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共同建设，努力整合所有参与者的国家发展战略。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转向了“新常态”局面，即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等速度的增长，中国制造业需要重新寻找生产场所以降低成本、提升技术水平从而保持竞争优势。“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将整合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发展空间与成本优势，但不同于以往基于市场成本考量而将过时和污染的生产

简单转移出去的做法，“一带一路”侧重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和建造新的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产业的扩展与提升。

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是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水平仍然很低，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建立一个优良的基础设施网络。由于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投资，公共资金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支持至关重要。亚投行是基础设施发展合作融资的新型模式，有助于解决长期投资的瓶颈约束，不仅其成员资格对真正有兴趣并愿意作出贡献的所有国家开放，而且其运作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原则，由其成员共同作出决策。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困难的调整期。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发展不平衡加剧，贸

当地时间2017年1月18日，英国巴金，中国首列驶往伦敦的货运列车抵达英国。CFP





2015年11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联合声明发布仪式。新华社记者刘卫兵 摄

“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合力并非易事，在推进和建设上要有轻重缓急，不能急于求成。”

易和投资增速放慢，保护主义盛行。“一带一路”带来的是开放、合作、发展的新风。由于政府支持，又有国际机构的参与，会对公共和私人投资具有吸引力，这会有助于改善内部和外部的贸易与投资环境，进而调动经济增长的潜能。

当然，由于国情复杂，利益不同，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合力并非易事，各种风险都有，如国家政局风险、投资风险和恐怖主义威胁风险等，需要认真研究，综合把握，利弊权衡。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基于长期的发展，不是短期行为，是“百年工程”，在推进和建设上要有轻重缓急，不能急于求成。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

者，需要协调各方利益，评估不同商业项目风险，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协定和规则，促进和推广成功的合作模式，构建关键的创业项目，寻找与各国之间关于发展经济、政治合作、安全保障和人员交流的契合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五个优先领域，也需要有效的协调机制，安排好轻重缓急，做好不同国家的利益平衡和共同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合作共赢的地区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历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一种新的方式，通过激发参与热情，动员资源投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

综合发展环境，创建新的发展动能，由此，有助于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世界发展中的问题，各种反应和对策都有。在当前美国新政府推行“美国第一”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形势下，中国基于开放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特别的意义。“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不是战略竞争，它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推动构建一个合作与和平的地区与世界。

本文作者张蕴岭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印中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拦路虎”

文 / Sreemati Chakrabarti

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度和中国需要搁置旧问题，共同追求最大程度的共赢。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访华之旅缓解了印中之间持续26年的紧张气氛，两国开始走上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前十年，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印中两国为了重拾合作的信心，实施了多项外交举措，

迅速扩大双边贸易，停滞多年的教育交流和旅游合作也重新得以发展。在政治层面，两国领导人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定期举行互访。自1976年以来，两国从未因边境问题发生武装冲突。除了细小的摩擦，双方政府都认可两国关系

处于友好和平的状态。

虽然没人怀疑上述说法，但不可否认，两国仍对彼此心存疑虑，这表明两国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印中两国公众对彼此国家的看法往往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感。这种负面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且持续，印

度的自由媒体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许多印度人认为，既然中国1962年曾“辜负”了印度的信任，就可能会一犯再犯。如今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印度对中国的戒备心也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中国也担心印度还藏着“西藏问题”的“杀手锏”。达赖喇嘛现居印度，且数十万西藏“难民”留在印度。中方认为，印度利用“西藏问题”攻击中国的可能性始终存在。2008年印度和美国签订了核协议，使得中国的疑虑加深，认为印度这一举动是在试图遏制中国。对于中国来讲，印度与中国冲突较多的日本加强来往也同样是个威胁。

从印度的立场来看，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边界争端、在喀什米尔问题上中国对巴基斯坦默许和支持以及“西藏问题”。这些问题双方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一致。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印度需要终止与中国的来往。

近期中国阻碍印度加入核

供应国集团，并且拒不接受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恐怖分子的举动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尽管如此，印度希望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能够尽快发生改变。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经由印度宣称是其被巴基斯坦侵占的领土，印方一直对该“经济走廊”持保留态度，中方也需要对该问题予以解决。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旨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为古丝绸之路区域）通过发展贸易、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区域联通。多个国家表达了加入中国这个宏伟计划的意愿。

如今，印度仍然对中国心存芥蒂，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华的经济政策，也涉及到印度对华总战略目标。据我了解，中国推行这一倡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内经济下滑，而“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地区发展的同时，有助于稳定中国经济。如果印度不抓住机会，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入其中，那么哪方会吃亏？正是印度。

印度拥有强大的安全和情报设施，因此不应该过分担心“一带一路”成为威胁。

当然，中印关系也有向好的一面。当下大约有14000名印度学生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有数以万计的印度中小企业在与中国贸易来往中大量获益，而印度电影也在进军中国娱乐市场。印度瑜伽和传统医药在中国日渐流行。每个月都有众多中国官员、学术界人士和商业代表团来到印度与他们的印度同行互动。如今印度政府决定向中国公民发放短期访问的电子签证，这种互动频率定会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国和印度的民间私人来往频率也显著增加。

我们不应忘记，印度和中国这两大文明古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和谐相处的历史。古代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来划分这两个文明。只有当两国在披上了“现代文明”的外壳后，才开始清晰地划分出国家边境——一条隔开两国人民的窄线。

“民族综合征”是印度和中国被殖民历史中留下的“后遗症”。只要印度和中国仍不放弃各自的民族主义进程，两国关系会一直原地踏步。然而即使阻碍重重，在一定范围内，印中两国仍然可以尽可能增进互动来往。希望有一天，频繁的交流会减少彼此的不信任感，帮助两国重新携手共进，实现最大程度的共赢。^[6]

2014年11月26日：中国浙江—印度企业交流合作大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期间，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左）与Xpro印度有限公司董事长、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悉达多·比拉握手合影。CFP



本文作者 Sreemati Chakrabarti 为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和社会科学系主任，德里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及名誉研究员。

中印需要合作共赢

文 / Prem Shankar Jha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印这两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创建互惠互利的框架。

当前，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两大经济体。世界各地主流媒体一直不断地强调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国像是“兔子”，而印度则被视为“乌龟”。“在这场龟兔赛跑中，乌龟能取得胜利吗？”这样的问题是不少文章乐于讨论的。它们认为印度或许会因为拥有更庞大的年轻劳动人口并且有比中国更顺畅的发展轨迹，从而后发制人，超越中国。这样的比较让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印正面临着一个世纪性的机遇——这一机遇不但会促进两国的发展，同时也会减少导致世界不稳定的因素，而这些不稳定因素将会导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中印在寻求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越来越多的优势互补合作，这已经逐渐取代了双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工业强国，但是由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各自不同的政策措施，导致其发展的不协调性，从而引发了产能过剩，尤其是中国的重工业，很多产能无法迅速消化吸收。如今，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约为2亿吨。在未来几年里，

中国承诺要消除1.5亿吨的过剩产能。

在煤矿开采和地热发电领域亦是如此。从2013年开始，中国增加了3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这一数字超过了目前印度全国的发电能力，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新增电力的需求。因此，现有的发电厂只利用了其发电能力的50%。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石油冶炼甚至服装行业都面临类似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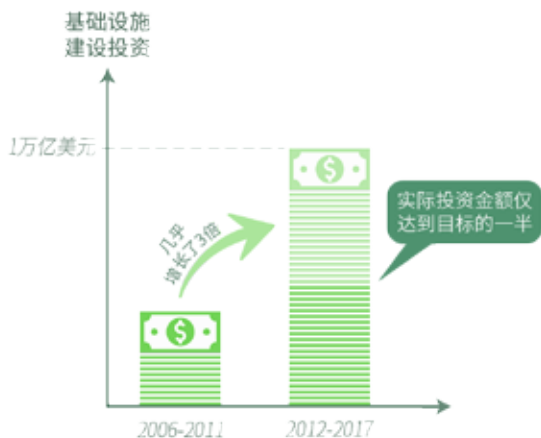
但是和这些产业所面临的问题相比，用于厂房修建和工业设备生产的重型机械制造和建筑业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如果现有的水泥、钢铁和发电厂都需要关闭以去产能，那在完成去产能这一任务之前，这些行业根本不需要建新的工厂。这样的情况之下，重型机械制造和建筑业将走向何方？他们的职工该如何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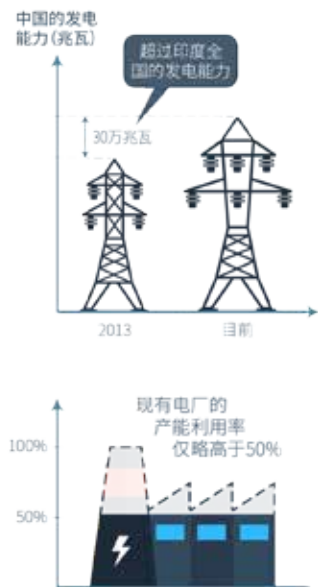
而几十年来，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严重匮乏：尽管其路网庞大，但状况糟糕；常年缺电，尤其在用电高峰

时段；铁路系统老旧，火车速度慢、事故多；港口经常因吞吐能力差而导致大量货船滞留。例如，金奈市的现代汽车工厂为了把汽车从泰米尔纳德邦运到距离不是很远的古吉拉特邦，宁愿选择绕南印度半岛一圈走水路，也不愿通过公路或铁路运送。

所以，中国和印度的互补性非常明显：中国在调节经济结构的同时，需要继续确保其机械制造和重工业的正常运行，而印度则需要吸引外国投资者，说服印度公司在印度投资。要做到这点，印度必须改善其投资环境。而一流的基础设施是最先决的条件。

2011年，印度总理辛格预





计印度需要在2012年至2017年间投资数万亿美元来改善基础设施以保持其经济发展速度，这个数字几乎为2006年至2011年的三倍。而如今，这一投资目标甚至连一半也没完成。因此，即便想要达到东南亚国家目前最普通的基础设施水平，印度也必须在未来五年相应加大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

中国的资源不仅可以极大地满足印度的需求，还会加快相关工程的完成速度。在这方面，印度明显落后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由私营公司承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都未按期完成，因此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2014年至2015年，印度政府的“经济调查”显示有总计为1310亿美元的投资工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停滞。

中国的公司不但可以帮助印度节约成本，而且会比西方公司更有效率。中国的这种能力体现在：它在不到12年间，建成了壮观的长江三峡工程；

2004年，中国高铁的第一笔订单是由日本公司完成的，而到2015年，中国在短短11年里已经修建了总长1.9万千米的高速铁路，开通了2000对高速列车。同中国公司合作会让印度企业更多地了解中国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方法，中国等同于批量生产了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这是其他工业化国家迄今为止都无法企及的。

两个国家合作的框架已经存在，即“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的项目主要由2014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注资。虽然印度是亚投行初始资金的第二大股东，并且中国领导人也多次暗示欢迎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迄今为止印度仍没有明确表态。

印度的谨慎来源于它对中國意图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印度战略学者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度在南海主导地位的战略威胁。从地图上看，组成“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看起来是把印度从北方、东方和南方进行包围，使其从周边孤立出来，从而严重限制了印度的影响范围。

但是这种对中国“企图”的解读过于“以印度为中心”，明显源于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境战争的“后遗症”心理。这些学者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以及政治霸权地位形成了挑战，因此中国必须保卫自己。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在2011年经济刺激政策结束之

后，所要面对的来自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

中国其实希望，一旦马六甲海峡被意外或故意封锁，“一带一路”能为其联通欧洲、非洲和中东提供其他途径：从陆路可以通过中亚和俄罗斯到达欧洲，此外通过陆路和海上航路，可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和阿拉伯海，连接到非洲和中东。

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还将为中国的大型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业提供订单。但是，迄今为止，更大的受益者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通过增加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度，它们将极大地提高自己发展的能力。

当时，曼莫汉·辛格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它刻意同东亚地区出现的霸权斗争保持距离，同时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双边政经关系。辛格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机遇而非威胁，它并不认为经过吉尔吉特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会对印度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要求造成威胁。但遗憾的是，莫迪政府并不这么认为，从而把一个对于中印两国均有利的局势演变成一个潜在的、两败俱伤的冲突局面。我们只能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而理性判断将可以很快重新占据上风。

本文作者为印度著名中印关系学者，著有《民族国家的没落：全球化、混乱及战争》以及《藏龙和卧虎，中国和印度能主导西方吗？》等书籍。

印度面对 “一带一路”的尴尬选择

文 / 林民旺

2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在北京举行了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的首次中印战略对话。这是继2016年10月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后，又一重要沟通机制的“复活”。虽然没有看到两国在分歧问题上取得显著突破，但是战略对话机制的重启本身就意味

着两国都希望中印关系能够稳定下来，恢复良性发展，而不是继续下滑。

媒体报道，当被问及印度是否参加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时，苏杰生的回答是：印政府仍在研究。按照笔者一直以来对印度外交的观察，当印方表态“研究研究”时，基本就意味着其态度比较“消极”。目前印度是中国周边国家当中唯一没有以正式文件方式表达对“一带一路”支持的国家。印方的解释是，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无法公开对“一带一路”表示支持。

2015年初，印度战略研究学者拉贾·莫汉撰文称，中国邀印加入“一带一路”这一招非常高明，使印陷入“丝路困境”，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开展海上合作，一方面却不得不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增长。从纯粹的经济合作角度看，“一带一路”

当然契合“印度制造”的需要，也符合莫迪政府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利益追求，但当印度将“一带一路”放置在地缘政治的角度加以考虑，问题就不一样了。

苏杰生在2016年第一届瑞辛纳对话中曾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印度对区域互联互通的看法，有关谈话间接反映出印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忧思。他说“基于不同战略利益的互联互通倡议正在亚洲大陆浮现”，应该指的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的“一带一路”、日本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他称，“印度不能对其他国家将互联互通作为影响未来选择的做法熟视无睹。在亚洲仍缺乏共同安全架构的情况下，这将导致没必要的竞争。互联互通应该有助于缓解地区国家间竞争，而不是加剧它。”“如果我们寻求一个多极世界，那么目前正确的做法就是创造一个多极的亚



2014年4月22日，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4届年会在青岛举行，中国海军与印度、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7国的7艘军舰组成联合编队，共同进行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图为印度什瓦利克号护卫舰上的印度军官。CFP



2014年4月23日，青岛，“海上合作—2014”多国海上联合实兵演习拉开帷幕。图为救援医生登失事船帮助救护。CFP

洲。只有对未来互联互通的开放磋商才能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在印度官方看来，区域互联互通本身就具有地缘政治内涵。尽管它们看似是经济合作计划，但却要优先解决安全上的顾虑才行。对印度而言，考虑到当前亚洲的实力分布状况，“多极亚洲”的形成显然需要平衡中国的实力优势。从这一点上看，印度如果支持“一带一路”，就会背离其外交政策大目标。然而，印度要依靠自身实力建设南亚互联互通，以部分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却又力不从心。为此，印度不得不借力日本推进其高速铁路、伊朗恰巴哈尔港等互联互通项目的建设。

印度的另一尴尬之处在于，作为印度传统的战略伙

伴，俄罗斯选择对接“一带一路”，中俄还和蒙古国共建中俄蒙经济走廊。不论从历史还是民意基础来看，俄都是印度最“铁杆”的朋友。但2017年以来不断传出俄和伊朗寻求加入中巴经济走廊的消息，2016年俄还与巴基斯坦举行首次了联合军演。如果俄与伊朗都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印度的尴尬可想而知。因此，苏杰生在中印战略对话中也提及，如果中巴经济走廊发展成为多边项目，对印度的主权主张将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印度还有一个尴尬之处：南亚其他小国都积极欢迎中国扩大在南亚的经济存在，公开表示了对“一带一路”的热情支持。孟加拉国非常希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取得实质进展，但囿于印度的态度而不敢

“有所作为”。尼泊尔一直希望能够打破地理上的藩篱，将自己发展成为中印两大经济体的“桥梁”或“通道”，希冀借“一带一路”东风来发展中尼印经济走廊，同时面对印度的不情愿“敢怒而不敢言”。而如果印度选择长期置身于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项目之外，显然将会鼓励、助推南亚其他国家对印度的离心力，这又是印极不希望看到的事。

对印度来说，是继续消极对待“一带一路”还是选择加入，仍是一个麻烦且尴尬的问题。

本文作者林民旺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以“一带一路” 破解中印巴安全困局

文 / 胡仕胜

唯有合作发展、互利共赢才是通向持久安全的正途。中印两国各自区域合作战略在南亚的对接之日，也将是中印巴打破地缘博弈困局的曙光之时。

地缘政治因素一直是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互动中零和性质凸显的重要原因。自彼此建交以来，三国互动关系就一直难以完全走出地缘安全困局，这种困局的核心主要在于印巴关系的零和性与冲突性，其形成与发酵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一方面，严重阻碍印巴、中印关系良性互动的克什米尔争端、西藏问题、中印边界争端均系英国殖民南亚次大陆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安全困局既是冷战期间苏印巴、美印巴零和性安全互动的某种延伸，更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奥巴马推行“亚洲再平衡”政策——主要指其中的“拉印制华”策略——的一种折射。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聚焦“发展”这个中印巴三国政府都面临的迫切问题，扩大三国在发展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这种尝试显然与以往各

国特别是大国在处理对印对巴关系时过度强调军事安全有着天然差异，对于中印巴三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具备培育彼此好感与合作精神、弱化安全对立和化解互动困局的巨大潜质。

印巴关系的零和困局

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分别独立建国伊始，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关系即充斥着零和性与冲突性。迄今为止，两国都

视对方为本国安全的第一大威胁源。冷战期间，两国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冷战之后又多次因跨境武装渗透和跨境恐袭等问题而屡起外交争端，乃至在克什米尔实控线与两国国界线一带兵戎相向，小规模流血冲突不断。1999年，卡吉尔地区的军事冲突险些酿成第四次印巴战争。60多年来，印巴双方多次开启和解努力，尤其从2002年开始，两国时断时续地推进了一揽子对话进程，但均

2017年2月14日，印度航展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汉卡空军基地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印度航展首次出现中国空军的身影。CFP





印巴国界门降旗仪式上的印度士兵和围观的群众们。CFP

未能成功。在穆沙拉夫将军执政时期（1999-2008），两国几乎就要通过“后门外交”为克什米尔争端划上句号，但国内极其保守的政治环境最终仍挫败了这种政府间的努力，功败垂成。

与此同时，国际上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密切往来的其他国家非但未能化解这种零和性困局，反而强化了两国的冲突性。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对印对巴外交政策无不打上深深的零和烙印。尽管美、苏都曾竞相拉拢印度，但最终还是苏联“抱得美人归”，其最大原因即是苏联自始至终与巴基斯坦保持着相当距离，不但在印巴战争期间支持印度，甚至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期间支持

卡吉尔冲突是印巴两国于1999年在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爆发的边境冲突，也被视为是继1947年、1965年和1971年后的第四次印巴战争。随后在美国压力下，巴政府主动妥协，冲突化解，但触发巴军方不满，并由此引发巴军事政变，文人政府被推翻。因为此次冲突发生在1998年印巴两国先后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后，国际社会担心双方因此被卷入核冲突，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

“

印巴两国曾经几乎就要通过‘后门外交’为克什米尔争端划上句号，但国内极其保守的政治环境最终仍挫败了政府间的努力，功败垂成。”

阿富汗。不过，苏印的每一次走近都刺激着巴基斯坦统治精英的生存危机感，并激活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安全反制神经。

出于尽可能构筑更大反

共反苏包围圈的目的，美国的政策与苏联大不同，不但将巴基斯坦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还希望通过大力援助将印度打造成“民主橱窗”。但美国这种印巴兼收的



2015年6月13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官员参加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一带一路”中巴安保经济合作洽谈会。IC

“虽然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事件后，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变得相对中立，以努力摆脱冷战期间非巴即印的‘选边站’政策，但当时的中国仍缺乏推进中印巴三方良性互动的资源与能力。”

政策因为没能有效化解印巴间的安全对立问题而显得效果极差，印巴均与美国保持疏离状态。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放弃“印巴并行”政策，与巴基斯坦联手抗击苏联，由此在南亚形成了以美巴（中）对峙苏印的冷战格局。

冷战期间，中国的对印对巴政策同样历经了重大波折，基本上也是在友印和友巴之间出现明显转向。这种大幅转向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为分水岭。此前中印关系非常友好，巴基斯坦则是美国反共反华包围圈的成员；1962年后，中巴关系迅速拉近，几近结盟，而中印关系直至冷战末期才逐渐正常化。

这种长期对峙局面迄今

仍妨碍着各国间安全互信的构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自我疗伤的境地，难顾南亚；美国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北约东扩与中东事务中，基本忽视了对南亚的经营。失去了超级大国地缘争夺的强力压制，印巴国内政治斗争趋于活跃，政治保守势力、宗教激进势力、反印或反巴势力不断阻扰着两国政府改善双边关系的诸多努力。冷战期间积聚的印巴分歧、对立与矛盾非但未能获得有效应对，反而显现明显扩大之势。

此时的中国尽管相对加大了对南亚的经营力度，但精力主要放在推动对印关系正常化及继续维持与巴的军事与政治关系上，无力促进印巴间的和

解。虽然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事件后，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变得相对中立，以努力摆脱冷战期间非巴即印的“选边站”政策，但中国仍缺乏推进中印巴三方良性互动的资源与能力。

“9.11”之后，美国重新重视对印对巴的经营，虽然采取“印巴脱钩”政策，但由于还是更倾向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伊斯兰堡，美印关系依旧不温不火。期间，美国还一度认识到印巴关系的非正常化严重影响着美巴反恐合作效果，美国第一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霍尔布罗克曾公开宣称要调解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努力解决掉这个“南亚火药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语），但由于新德里的强力反对，霍尔布罗克先生甚至在有生之年都没能踏入印度国门。

直到小布什政府在战场上打赢了第二场伊拉克战争后，美印关系才出现新的进展，但其代价却是美巴关系开始龃龉不断。2011年击毙本·拉登后，奥巴马政府果断宣布反恐战争结束，并重新将战略资源聚焦于应对传统大国崛起（主要指中国的崛起）对美全球霸权构成的战略挑战。由于奥巴马政府坚信其“亚洲再平衡”战略离不开印度的战略支持，加之本·拉登被击毙后奥巴马政府对巴基斯坦反恐需求的明显下降，奥巴马政府迅速且不断加强对印的战略拉拢。结果，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巴关系不断恶化，至今仍未找到根本改善的路径。

中印巴关系面临复杂处境

苏联（俄罗斯）、美国、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多边互动一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魔咒，首先因为上文提到的印巴关系的零和性决定了任何包括印巴在内的三边或更多边互动的零和性，不解决印巴间的安全分歧问题，或找不到化解印巴间安全困局的有效路径，任何包含印巴在内的多边关系都难形成良性互动；其次在于苏（俄罗斯）、美以及包括冷战期间的中国在内，这些国际力量不但缺乏强有力的增进印巴间共识的选项和努力，而且大都聚焦于具有强烈零和性与排斥性的安全领域和安全问题。

长期困扰印巴的两大问题，即克什米尔问题和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问题，带有强烈的不可调和性，支持一方立场即意味着反对另一方立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强烈要求第三方介入，但印度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介入的国家必然会得罪印度，这使得任何与印巴同时打交道的国家都要陷入“选边站”的两难。反恐问题更是如此，由于印度的反恐对象日益指向巴基斯坦，导致其他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任何政策倾向不是得罪印度就是得罪巴基斯坦。

相比于美苏（俄罗斯），中国在处理对印对巴关系时所面临的互动困局更加复杂。中国与印巴都毗邻而居，而且克什米尔问题和反恐问题也都直接涉及中国，这种地缘现实令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很难继续效仿美、俄的“选边站”政

策。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因素（主要指中巴关系）超越了西藏问题、边界争端、贸易失衡等其他障碍，成为中印关系的最大干扰源。近年来，中国对印对巴关系似乎陷入更大的复杂境地。这不仅是由于印巴关系的对峙与冲突性依旧未变，还由于中美地缘战略博弈日趋尖锐，中国的对印对巴政策始终要面临其他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严峻干扰。

一方面，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以及对海外市场、资源与资本的日益依赖，中国绝不愿也绝不能在印巴之间搞“选边站”，因为任何选择都会对中国安全与发展利益构成严重冲击或威胁。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印巴间搞平衡的空间也在日益收窄。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日趋尖锐，美国精英阶层日益视一个强大的印度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资产（美前国务卿希拉里语），这突出表现为奥巴马政府将印度视为其“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关键”（前防长帕内塔语）。近年来，美对印不惜突破各种底线予以“破例照顾”

结果，美日的不断拉拢使得印度对中国的期待也“水涨船高”。尤其是在对巴关系上，印度希望中国效仿美的做法，对巴基斯坦保持持续且足够的压力。然而，出于东南亚地区的总体稳定及边疆安全的考虑，以及基于中巴友好关系的历史惯性，中国不但不可能追随美国的“弃巴”政策，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还要投入更多资源，推进中巴发展合作，提升中巴经贸关系，将两国关系由过去高度重视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考量向高度重视地缘经济方面转化，构建中巴经济走廊、与巴共推“一带一路”建设即是明证。但中国的努力在新德里看来就是要将印度陷在“南亚澡盆”里，甚至将当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理解为一种构筑反印同盟、强化巴基斯坦反印能力的努力。

印度越是这样理解，就越倾向于在安全上加强与美日的军事合作力度与广度，结果又导致中国和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战略疑虑并反映在一系列的安全政策上。这使得中印巴互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因素超越了西藏问题、边界争端、贸易失衡等其他障碍，成为中印关系的最大干扰源。”

与拉拢，对巴基斯坦则反复打压。当前，至少在防务合作上，美印已达到“亲密盟友”水平（美前防长防长阿什顿·卡特语）。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支持日本强化与印度的防务合作与战略拉拢。

动尤其是安全互动或军事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走进了一个彼此互损的怪圈：中国着眼美国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印度着眼中国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巴基斯坦着眼印度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在战略

均势上，巴基斯坦之于印度越失衡，巴就越重视与中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印度之于中国越失衡，印就越重视与中国存在战略互疑或冲突的美、日等国加强防务合作与战略互信建设。其结果就是，中印巴战略互疑的不断加重。

“一带一路”： 从以邻为壑到同舟共济

如何摆脱地缘政治魔咒对中印巴互动的深刻影响呢？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以“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为指导思想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是一条最佳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可简要概况为重在推进“一个新安全观、两种发展、三大稳定”。

“一个新安全观”是指“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包容式发展合作获取彼此持久安全，而非通过军事同盟谋求排他式绝对安全，而后者正是导致前述美印巴、苏（俄罗斯）印巴和中印巴安全互动困局的最重要原因；“两种发展”指“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中国边疆地区包容式发展及中国周边地区包容式发展，这种包容式发展正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是推动社会“去极端化”的重要路径，也因而可被视为应对印巴间涉恐难题的有效手段；“三大稳定”指“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中国边疆地区稳定、中国周边地区稳定以及中邻关系稳定。“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追求“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人所不

欲”也“勿施于人”。

如上所述，美印巴、苏（俄罗斯）印巴之所以动辄就陷入零和博弈的互动怪圈里，主要即在于这种三边互动非但没能减少印巴间的敌对情结，反而加大了印巴间的战略互疑乃至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构建共同发展基础、增进彼此发展共识，从而构筑“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并朝着最终建设“命运共同体”迈进。只要本着这样的奋斗目标，久而久之，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中印巴必会扩大共同利益面，挤压相互分歧面，弱化彼此对抗面，并最终形成“同舟共济”的良性互

动格局。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还包含有这样一个诉求，即打破困扰国家间相处共存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魔咒，努力将以邻为壑的旧有地缘博弈思维转变为同舟共济谋发展的地缘合作行为，将周边地区转化为国家发展的优势资源，而非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阻碍。当前，逆全球化现象日益明显，自由贸易陷入低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印两国有理由、有义务主动担当，填补因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收缩甚至退出而形成的全球治理空白，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资源。

“‘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将以邻为壑的旧有地缘博弈思维转变为同舟共济谋发展的地缘合作行为，对于中印巴而言，这一倡议具备培育彼此好感与合作精神、弱化安全对立和化解互动困局的巨大潜质。”

2015年5月12日，中巴经济走廊南起点——瓜达尔港集装箱货物运输启动仪式在码头举行。新华社





自 2007 年起，印度陆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都会举行反恐联合军演，军演活动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交替举行，至今已举行六次。图为 2013 年 11 月 7 日，“携手—2013”中印陆军军演在中国成都演习直升机项目。CFP

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南亚地区，中印两国都在发挥大国作为，推进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并为未来区域合作奠定基础。目前，既有中巴经济走廊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也有印度主推的不丹、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四国联通合作机制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合作组织阔步向前；既有中国承建的汉班托塔港、皎漂港、科伦坡港、瓜达尔港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有印度承建的恰赫巴哈尔港、吉大港、实兑港的现代化改造在稳步迈进；既有中国与东南亚间的泛亚铁路呈现新的发展势头，也有印度“东向行动”在加快步伐。

尽管印度政府至今仍对“一带一路”倡议心怀疑虑，尤其是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但也无妨，因为印度莫迪

政府当前正在推进的次区域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大力主张的。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印度当前推进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带有明显的“排巴”性质，中国大力推动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实际上是在为未来中印两国周边区域尤其是中西南亚的区域一体化“补齐短板”，即为中印次区域合作战略在未来实现对接奠定物质基础。尽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仍步履缓慢，但印度推进的次区域一体化进程进展明显，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项目也陆续上马，这些实际上也已使得孟中印缅走廊初具了形态。至于拟议中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也因尼政局的落稳与尼印关系的改善而有了一个相对光明的前景。可以想见，中印两国在周边地区打造

的一个个次区域合作平台终将合成一个“凝聚发展共识，共襄太平盛世”的大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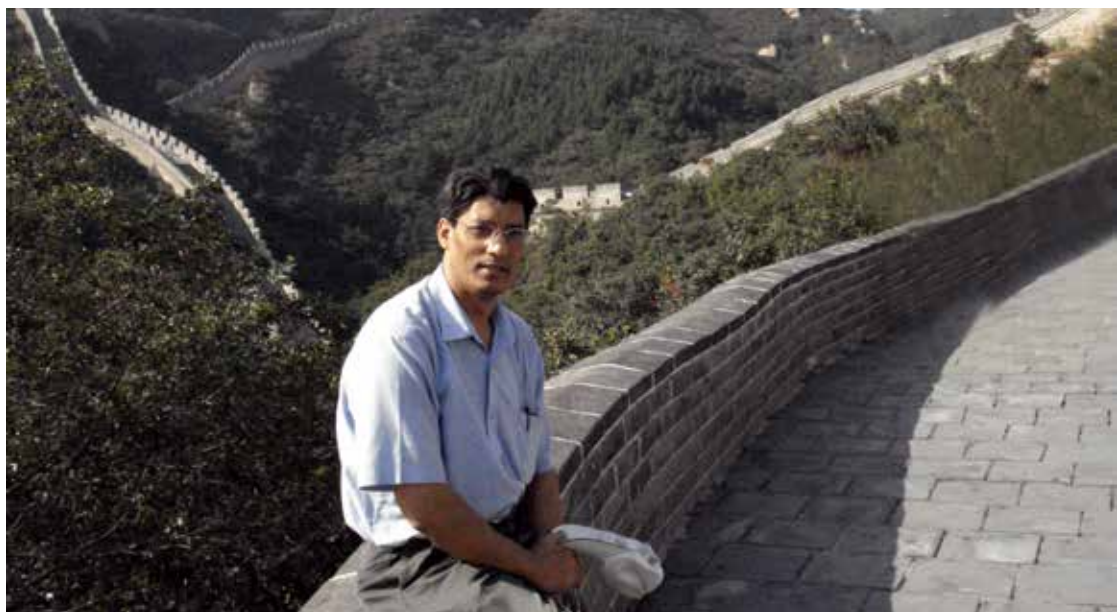
唯有合作发展、互利共赢才是通向持久安全的正途，相信中印各自区域合作战略在南亚的对接之日，也将是中印巴打破地缘博弈困局的曙光之时。只要中印两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与新兴大国在经营周边地区时能够抛弃肇始于西方政治学的地缘零和博弈的视角，本地区也必然会迎来合作共赢、持久发展乃至长治久安的局面，毕竟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为了加剧地缘博弈，而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自身发展，愉快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本文作者胡仕胜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

中印要“对话”，不要“猜疑”

专访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狄伯杰教授

文 / 温志宏



印度著名汉学家狄伯杰认为，在印度传播中国古典文化有助于印度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图为狄伯杰在游览中国长城。

1991年秋天，刚从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的年轻学者狄伯杰从香港转机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学习期间，他还与同在北大学习中国姑娘王瑶相识相恋，数年后喜结连理。

那时的中国内地和印度之间没通直航，来中国留学的印度学生寥寥无几，中印之间的跨国婚姻更是少之又少。但到今天，人们可以从国内多个城市直接飞抵对方国家，来

中国留学的印度学生数量超过13000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组建的家庭也屡见不鲜。

后来回到尼赫鲁大学继续学术研究的狄伯杰如今已经成为印度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和中印关系学者。在他看来，虽然当下的中印交往在两国国际交往大数据中占比还很小，但与26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日，在狄伯杰教授访问北京期间，本刊记者就中印关系和文化交流等话题与他进行

了对谈。狄伯杰用汉语接受采访，完全不回避中印之间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初，狄伯杰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结识了中国姑娘王瑶，数年后二人结为夫妻。



的新旧问题，但他通晓中国文化，对中国人乃至中国对外交往的“性格”有深入理解，他认为推动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解药在于“对话”，而非“猜疑”。

“一带一路”可否延伸到印度？

2016年11月5日，狄伯杰在印度北阿坎德邦的都安大学进行了一次讲座，给师生们专题介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位于印度东北部的北阿坎德邦与中国西藏接壤，属于“一带一路”西向联通的关联区域。作为都安大学中文系的创建者，狄伯杰希望更多的印度普通人和年轻人能了解中国和“一带一路”的具体情况，因为“除了知识界人士，印度人对‘一带一路’几乎没有概念”。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于2013年，其核心在于发挥中国交通建设的优势，通过基础设施联通，推动中国和周边国家进行深入的发展对接，进而将“增长的亚洲”和“发达的欧洲”连接起来，带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

三年多时间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支持，4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不过，这个名单中并不包括中国西南方最大的邻国印度。据狄伯杰分析，印度不积极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少人认为“中国对于印度的敏感问题不敏感”：不仅“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印巴领土争议，活跃在东北邦地区的一些武装反对派也是印度很大的

安全顾虑，在这些地区与中国合作自然是困难重重。

但狄伯杰并不认可印度官方当前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他认为漠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顾虑”。“正是因为有问题，才需要谈判。印度应该和中国以及巴基斯坦共同讨论合作，看是否有可能把中国西部联通的某些走廊支线延伸到印度境内，以此推动三方互信。”

狄伯杰举例说，如果中巴经济走廊的某些地段延伸到印度西部，甚至古吉拉特邦，那么就可能从中推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信任措施。在能源合作方面，虽然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已于2015年底正式启动，但线路长，过境区域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是不是可以和中国商谈一个新的经济走廊，把新疆和中亚的联通优势继续伸到印度北部，比如说达拉克地区。边界分歧可以搁置和管控，不应影响双方基建和经济合作交流。”

再比如，根据“一带一路”南线铁路联通规划，从中国西藏日喀则通往中尼边境的铁路正在修建中，预计可于2020年完工，之后铁路还将修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其他城市。“印度边界地区是最穷的地方，如果中印铁路网能在中尼铁路的基础上实现对接，既可以让当地人得利，又可以缓解安全威胁，促进经济合作，三方都受益，为什么不能做呢？”

印度舆论常常认为，和中国合作就会带来安全挑战，但



2012年12月4日，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库尔卡尼参观了位于深圳的“谭云山中印友谊纪念馆”。

狄伯杰觉得“印度需要解放思想，要改变思维和心态，通过对话、联通和交流来去掉对中国的心理恐惧。猜疑只会让状况更加糟糕”。

“印度需要中国”

去年4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即，瑞士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让·皮埃尔·拉赫曼发表观点说，西方国家不可能强迫中国去遵守自己都不遵守的规则。“如果人们对中国的崛起依旧置若罔闻的话，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所谓的‘新兴经济体’，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金砖国家，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而且，中国还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依靠侵略他国而崛起的世界大国。”

这也是狄伯杰眼中正在深刻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和权力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印度要看清楚这个现实。印度不少学者一方面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比如在短短几十年里减少7亿多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实力心怀恐惧。印度非常关注中国大量的国防投入，但这与中国的经济

奇迹有关，如果印度的整体经济水平提高，同样会给国防投入大量财力。”

从去年年初以来，因为在反恐和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分歧不断，再加上“一带一路”、边界争议和达赖等新老问题，中印关系一路下滑，以至于去年年底的排灯节期间，印度社交媒体发起了“抵制中国货”运动。狄伯杰认为，这些事件其实都是莫迪政府与印度人民党推崇民族主义路线的反映，这也正是影响中印关系的第二大因素。

“莫迪政府过于走民族主义的路线，用一些小的争端来造成僵局，这不是明智的决策，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绑架整个中印关系。反恐不是中印之间的主要问题，加入核供应国也不是，主要问题是我们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双边关系，同时要看全球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狭隘的视角不仅不会给两国方带来好处，还会在很多方面破坏中印关系，加深互不信任的状态。”

不过，虽然当前的中印关系波折颇多，但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却有诸多契合点，不仅印度国内区域联通规划有可能和“一带一路”连接，中国经济转型也正赶上了“印度制造”战略，经贸领域的合作前景被广泛看好。目前，有超过500家中国公司在印度注册，印度已成为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增速最快的国家，中国去年对印度的投资高达10.63亿美元，是2015年的6倍多。“虽然印度没有公开表态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但莫迪政府在务实合作方面很明智，双方领导人互访签署的协议里已经包括两国企业要展开的合作。”

狄伯杰提到两个数字：在能源领域，尤其是电力方面，中印企业合作非常紧密，印度约有80%左右的电力设备都来自中国，诸如信实工业等大型企业莫不是靠着中国公司起家；此外，印度作为“世界药房”而享誉全球，而印度药品之所以廉价，是因为90%的原材料都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禁止

原材料出口印度，其制药业会受很大打击。“中国在印度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虽然双方贸易总额还不尽如人意，但已经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中印能够在各自的经济和国家发展方面有更好的合作，对接发展战略，效果会更好。”

就在今年3月初，印度辩喜基金会的一部分学者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学者就未来美印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有关加强印美日合作的声音引起外界关注。在狄伯杰看来，中国和印度在安全方面可能会渐行渐远，印度确实是在靠近美国、拉拢日本，“但印度也肯定不会成为美国的副手，因为印度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认识中国不能少了文学”

塞兰坡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所辖的一个小镇，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地名都极其陌生。但在1809

2016年6月15日，狄伯杰访问北京语言大学，与该校学生一起进行了国别文化介绍、读书分享会和传统手工制作等活动。





1. 2009年，狄伯杰出版了译作《中国诗歌》，将自春秋战国至元朝的88首中国诗词翻译成了简洁流畅的现代诗歌。
2. 2016年，由狄伯杰翻译的《论语》印地语版在印度出版。
3. 狄伯杰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目前已经作为印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教材。
4.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印地语版本正在翻译过程中。

诗开始有了词的味道”，他还看到了先秦散文里强烈的民本思想，“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内涵广大。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文化的镜子。”

狄伯杰认为中印出版界之间的互动合作一直以来都被忽略了。自马士曼翻译《论语》前九章以后，印度并没有人把此类著作继续翻译成印地语。狄伯杰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翻译儒家经典《四书》。翻译进度并不快，因为两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差异很大，而且翻译对象是文言文，很多中国人读起来都非常吃力。但得益于在中国访学期间的“古代汉语”课程，再借助字典、网络以及各类外文版和注释版，狄伯杰最先“磨”出了印地语版的《论语》。

幸运的是，中印两国于2013年由高层推动启动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狄伯杰担任印方负责人，参与审定中国著作书目，他的《四书》系列正好被列入其中。此外，书目中还有24本从未以印地语面貌出现过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例如《红楼梦》和《白鹿原》。目前，《四书》《骆驼祥子》《活着》《看上去很美》等印地语定稿已经送交出版社，正式出版指日可待。

狄伯杰的不少印度学生对中国唐宋文化感兴趣，但汉语水平和深层次理解还很有限。即便如此，狄伯杰仍然认为在印度传播中国古典文化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中国文明的基因，如果印度人能够接触到，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促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⑧

年，最早的中国儒学经典英译本就出现在这里，译者为英国传教士马士曼，他翻译出版了《论语》前九章。13年以后，1822年，这位传教士又在这里出版了最早的《圣经》汉译全译本。

狄伯杰在研究中印学过程中注意到了这段历史。据他介绍，早在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就已经开始培养汉语人才，但因为学生不多，后来没有持续下去。1921年，印度学者泰戈尔在圣迪尼克坦小镇上建立国际大学，并先后聘请了多位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化。曾被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称为“伟大学者”的谭云山是其中的先驱人物，他不仅创办了《中印研究》，还于1937年靠个人力量筹建了国际大学的中国院，现在学校里的许多旧图书都还是他在民国时期从大陆带去的。

但狄伯杰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将近200年前印度就出现了重要的中文译作和典籍，也曾有老一辈学者倾力推动中印文明文化交流，但近几十年来印度在培养汉语人才和翻译汉语作品方面的成效却“令人失望”，中印在高校合作、媒体对话或旅游互动等多方面都欠缺对话机制，而语言不通和交流不畅直接影响着中印互信对话与经贸领域的深入发展。

狄伯杰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特别感兴趣，也是第一位将中国历代诗词代表作翻译成印地语的印度人。2009年，他出版了译作《中国诗歌》，其中将春秋战国至元朝的88首中国诗词翻译成了简洁流畅的现代诗歌。狄伯杰对于中国古典作品有着准确而深刻的理解，他不光认为“《离骚》的语言非常漂亮，晚唐的

“蒸蒸日上”的印度

文 / Deepa Nair

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投资项目将为印度新兴的太阳能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力。

2016年1月，来自包括印度在内的57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出席了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之为“历史性”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启动会议。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主要着眼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成为与世界银行比肩的多边金融机构。

其中，成员国印度是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印度初期投资额是80亿美元，仅少于中国投入的297亿美元。亚投行开张一年后，印度作为亚投行的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有望从亚投行获批5亿美元贷款用于发展太阳能项目。

加入亚投行这一举措，将为印度的太阳能产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当下，亚洲经济体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差、区域连通性不足、城市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亚投行被认为是能够打通这些阻碍的一剂“良方”。电力在印度的许多地区仍是一种奢侈品，成千上万的印度村庄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发展太阳能产业迫在眉睫。

能源困境

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个印度城市，都时常发生停电事件。2012年，印度五大电网中的三个曾同一时间出现故障，导致印度20个邦和新德里遭遇大停电。即使电网覆盖的城市和村庄，也面临着频繁的断电。印度人均用电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在2012年的大面积停电事件中，印度北部电网首先出现故障，导致约3亿印度人在两天内无法使用电力设施。在此期间，当地交通指示灯停止运作，造成交通堵塞，医院停止运营，多个大城市中火车停止运行。随后，包括加尔各答地区在内的印度东部电网、东北电网也相继出现故障。

尽管这类大停电并不常见，但印度长期以来一直饱受电力短缺问题的困扰，全国各地都频繁采取限电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作用将显而易见。亚投行将投资重点放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打消了人们此前对其宽松的贷款标准可能会导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煤炭等化石能源项目增多的担忧。如

今许多国家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急于提高能源产量，对环境破坏的担忧仍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

通过投资，亚投行将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行业，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印度中央邦等地已就大型农村水利工程项目向亚投行申请资金支持，预计亚投行未来还将持续加大投资力度。

印度在太阳能发电领域也雄心勃勃。印度在可再生能源融资领域面临着众多挑战，如贷款利率高、风险评估标准保守以及缺乏长期债务融资工具。此外，印度的商业银行对太阳能产业贷款支持不多。因此，亚投行成为印度启动太阳能产业至关重要的资金来源。

同时，印度也在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由金砖五国新兴经济体共同成立的贷款机构）进行商洽，以求在4月1日开始的新的财政年度中募集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频繁的断电正影响着印度的经济活动。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正与中国等其他强大经济体展开竞争，因此解决电力问题是燃眉之急。

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解决用电问题的紧迫性，因此迅速采取行动以提高发电能力。2015年，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电力生产国（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和世界第四大电力消费国。截至2016年9月，印度电力装机容量已达到306.36 吉瓦，排名世界第五。

纳伦德拉·莫迪于2014年就

任印度总理，上任前，他曾承诺在2019年实现印度稳定的电力供应。在印度，电力价格受到严格管控，地方供电价格远远低于市场成本价，使各邦均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印度发电能力持续增强，然而各邦配电公司均面临财务困难，目前已积累了共计约700亿美元的债务，甚至导致无力支付发电厂相关费用。印度想实现为其庞大的人口提供稳定电力供应的目标十分困难。

根据塔塔电力公司的报告，在2014至2024年间，印度电力需求年平均增长率为5.2%。目前，印度每年需要10689.23亿度电，但电力缺口达到3.6%。

仅仅通过化石能源发电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电力需求。印度的煤发电厂仅占其总发电量的60%，并且时常面临燃料短缺问题。国内煤炭生产无法满足需求，而进口煤炭价格十分昂贵，使得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莫迪总理已将保障电力供应列为其执政的重点工作，同时他也承诺参与国际社会为遏制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

印度目前是世界上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因此印度希望在不大幅增加碳排放的情况下满足其电力需求。当下印度80%的原油和18%的天然气依赖进口，每年需要花费1500亿美元用于进口能源，因此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格外关注。

太阳能产业崛起

近期，莫迪政府批准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太阳能产业计划，

内容包括承诺2022年底将印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升至175吉瓦，其中太阳能装机容量提升至100吉瓦，并在未来七年里吸引10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

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造价和融资成本降低，太阳能开发成本也逐步下降，吸引了更多投资者。据估算，2019年，印度可以实现太阳能和常规能源之间电网平价。

从地理上看，印度十分适合发展太阳能发电。由于位于赤道附近，太阳辐射高，印度平均每年有约300个晴天，潜在的太阳能发电量为5000兆千瓦。

前不久，印度以2.97卢比每千瓦时的低价签订了一项在中央邦建造装机容量为750兆瓦发电厂的合同，这预示着印度的能源政策正在悄然转向。说不定有一天，印度太阳能发电能够比化石能源发电成本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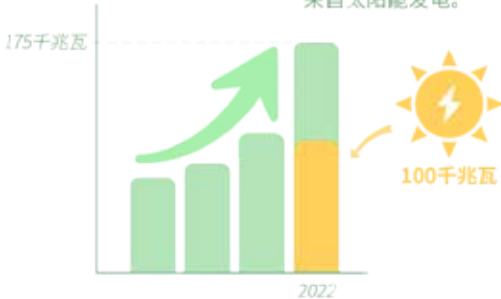
艰巨的挑战

尽管印度希望增加太阳能产业的投入，但现实中仍面临重重挑战。由于印度最大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所在邦声称无法按照此前招标合同价格向发电企业购买电力，导致该项目陷入了僵局。

据报道，印度数家国内和外国清洁能源公司已拖欠数月的工资。当更多风险出现在投资者面前时，印度宏大的绿色能源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

印度可再生能源投资面临的障碍是其落后的公共配

印度政府承诺，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提升至175千兆瓦，其中100千兆瓦来自太阳能发电。



电设施，这被认为是想要完成莫迪政府的太阳能发电能力目标和气候应对承诺的最大阻力之一。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3月，印度国有的电力公司累积亏损达到3.84万亿卢比。

这表明印度的配电系统无论在传统还是可再生能源方面均无法提供满足预期需求的稳定电力，也无法吸引到更多的客户。

想要扭转这一局势，首先需要完成发电方式和电力分配这两个主要领域的转型。印度经济发展迅速，需要摆脱对煤炭的严重依赖，为其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稳定电力，因此保持太阳能发电行业良性发展至关重要。有了亚投行的助力，相信印度太阳能产业发展将蒸蒸日上。

本文作者为印度自由商业记者，曾为《印度商业线报》撰写商业和金融类文章，内容涉及金融、保险、教育和医疗等话题。此外，她还在 Bajaj Allianz 保险公司担任通讯顾问。

泛亚铁路网

“一带一路”南线通道的挑战

文 / 马斌

沿线国家局势动荡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和额外成本，以及部分国家间关系的变化阻碍着泛亚铁路不同线路的建设进程。

铁路是“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铁路互联互通的主要路线包括北、南两部分，即从中国新疆、东北等北部省份出境，与俄罗斯、中亚等国家铁路连接开往欧亚国家的北线；以及从中国西南省份出境与东南亚国家相连的南线。它们是构建“一带一路”陆上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主要支柱，能为中国与沿线地区和国家的人员、商品和文化交流提供新通道。然而，与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北线通道的快速发展相比，以狭义上的泛亚铁路为代表的南线通道建设则相对滞后。

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泛亚铁路由东（中-越-柬-泰-马-新）、中（中-老-泰-马-新）、西（中-缅-泰-马-新）三条路线组成，全长1.5万公里。目前，泛亚铁路中国境内

段建设顺利进行，但中国境外段东、西两线的情况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起色，只有中线于近两年取得一定进展：中老铁路于2016年12月全线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建成）；中泰铁路一期测试段预计2017年内开工。简单来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未能在“一带一

2016年7月28日，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2次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新华社



路”南线铁路通道建设上彻底打开局面，既与相关国家国内局势的动荡有关，也与各方对铁路成本收益的核算有关，还与地区内外大国的影响有关。

首先，动荡局势带来的挑战。泛亚铁路建设不仅需要各方投入大量的资源，还需要具备相对稳定的环境。然而，过去几年，缅甸、泰国、柬埔寨等泛亚铁路关键枢纽国，或是因内部武装冲突导致危险激增，或是因选举引发社会政治动荡。泛亚铁路建设因此受到干扰：一方面，沿线国家与中国围绕泛亚铁路所签的协议与合同，有些无法按期履行，有些被宣布无效，部分项目因此不能正常开展；另一方面，泛亚铁路沿线国家内部局势动荡危及参与铁路建设和运营的企业人员与财产安全，相关政府和企业必须调整规划，或者暂停项目等待危险减弱再重启，



昆明火车新南站集铁路、轨道交通、公交和出租等市政交通设施为一体，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服务功能最齐备的国际化综合交通枢纽。CFP

或者加大安保投入导致项目预算出现问题，但不论何种情况发生，都使泛亚铁路建设受到干扰。沿线国家局势动荡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和额外成本，以及部分国家间关系的变化阻碍着泛亚铁路不同线路的建设进程。

其次，平衡成本收益的压力。能够实现成本收益平衡是各国参与泛亚铁路建设的普遍前提。对泛亚铁路东南亚沿线国家而言，修建与中国相连的铁路的最主要目标是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一初衷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导的共享理念并不相悖，也是这些国家们对与中国进行铁路联通抱有兴趣的基本推力。对中国而言，泛亚铁路能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系提供新通道，既可以推动双方的经贸往来，又可以密切相互间的联系；同

时，还能夯实“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但问题在于，各方对成本收益的估量存在差异，一方认为经济合算的规划在另一方看来可能并非如此。如果各方不能在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方面达成共识，泛亚铁路就很难从构想转化为现实项目。

比如泰国对修建中泰铁路北段（廊开-呵叻）不积极的重要原因就是该路段沿线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人口数量较少，无法为列车常态化运营提供足够的客源和货源；若仅靠中国的过境客货运输维持运营则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再加上当地的公路和航空客运价格较为优惠，铁路运营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增大。对中国而言，虽然中泰铁路如果建成将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标志性项目，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但在战略收益和经济成本之间寻找合

理平衡仍是基本原则。

再次，政治效应产生的影响。铁路联通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一样，都会在政治领域产生附加效应。如果泛亚铁路运转良好，将成为巩固和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政治关系的有利因素，对中国在当地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尽管“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铁路联通以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为基本出发点，但部分国家一直担忧由此带来的政治效应。泛亚铁路沿线国家对这个领域相对收益变化的感知比较敏感，因此合作项目在建设资金筹措方案或沿线经营权等方面都可能受到影响。

最后，地缘政治竞争的冲击。泛亚铁路建设将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结构重塑过程中，对



2016年12月15日，一辆列车驶过中铁六局承建的大梨坪营双线特大桥，该大桥位于中越、中老国际铁路昆明至玉溪段。新华社记者张湘涛 摄

于一些影响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国家而言，他们会非常重视泛亚铁路建设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前景。比如过去几年，日本加大在东南亚铁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印度提出和力推“东进”战略等均影响了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南线铁路通道的认知与预期，使得有些国家参与意愿降低、有些国家改变合作条件等情况发生，进而影响泛亚铁路的预期进程。

总之，政局动荡、成本压力、政治忧虑和地缘竞争等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一带一路”南线铁路通道建设的影响因素。今后，上述挑战的具体内容可能会随着局势发展而发生变化，使此前相对次要的部分因素逐渐突显出来。

鉴于“一带一路”南线铁路建设使中国增加了直通印度洋的新路径，一直在印度洋地区扮演关键大国角色的印度的政策选择尤其值得关注。尽管印度目前并非影响“一带一路”南线通道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一带一路”南线铁路网与中巴经济走廊使中国从印度南北两个方向构建起通往印度洋的通道，增强了中国影

响印度周边地区局势的能力，印度会以何种态度和措施来应对这一变化，对“一带一路”及南线铁路通道建设前景均有极大影响。因为，作为印度洋周边地区环境的决定性力量，印度的态度和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所处环境的性质。

深化，印度可能因其消极态度和措施而孤立于“一带一路”项目之外，在新的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相对于印度因中国在其周边推进“一带一路”而遭受的地缘政治挑战，这对印度而言是更加不利的前景。

考虑到印度在和开展经济合作过程中一直采取的谨慎

“印度的态度和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所处环境的性质。”

如果印度主要以相对积极的态度看待“一带一路”，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培育地区新兴市场，分享地区发展成果，在推动国内和地区发展的同时，提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那么，就极有可能支持甚至推动“一带一路”南线铁路通道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如果印度看待“一带一路”的主要视角相对消极，那么，印度可能继续维持对南线铁路通道及“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怀疑和抵制；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和南线铁路通道建设的推进，以及中国与相关国家经济合作的

态度，如何避免两国在“一带一路”南线铁路通道及其他相关项目建设中重蹈覆辙是双方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印度而言，面对中国从其南北两侧不断扩大与印度洋经济圈联系的前景，一方面适当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合作以加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另一方面防止中印地缘政治竞争转入自我强化轨道进而影响双方经济合作，是相对理性的选择。

本文作者马斌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四份工作 十一个孩子 近二十项职责 谁是最繁忙的 母亲

(占产业总量
百分比)

70%

60%

50%

40%

30%

棉花

谷物

工业品

淡水鱼

大米 (年)

为保护负重的长江
WWF在行动

更多信息登录: www.wwfchina.org

包钢入印度记

文 / 妮均丞 图片由包钢集团提供

中印企业的多层次合作将为致力于培养国际合作精神的“一带一路”新开放战略积累微观层面的有益经验。

2017年2月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九，也是多数中国企业结束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周末休息日。中国包钢集团的轧钢工人刘鑫这天值班，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操作室里，他通过

寥寥数台电脑操控着包钢轨梁厂的2号万能轧钢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建成于2006年，其核心是引自德国西马克梅尔公司的CCS万能轧机和工艺，这里产出的百米重轨是这

个中国北方重工业基地目前的拳头产品。尽管当下中国钢铁市场还像车间外北方的初春一样寒意逼人，不过这里的生产已经排到了今年4月。

2016年10月，世界钢铁

包钢生产的百米钢轨被广泛用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铁路建设中。



协会在迪拜召开第50届年会，来自包钢集团的一组数据引起了印度金达莱集团参会人员的高度关注：中国京沪高铁的试验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486.1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在已建成的郑（河南郑州）徐（江苏徐州）路段试验最高会车时速超过420公里，相当于每秒“飞驰”117米；中国最大的煤运通道大秦铁路和“中南通道”近年先后采用了包钢生产的75N贝氏体钢轨，这是一种具有高强度韧性和耐磨性的钢材产品。

目前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其中超过50%的轨道产自包钢集团，因此这组数据有力地说明



1959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为庆祝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

“目前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其中超过50%的轨道产自包钢集团。”



了包钢重轨质量位居世界最前列。金达莱集团于是通过世界钢协联系到包钢，双方随后达成了包钢向金达莱下属钢铁公司输入技术服务的协议。

金达莱集团面临的技术瓶颈正和刘鑫操作的万能轧钢生产线有关。其下属的金达莱钢和能源有限公司也生产钢轨，主要设备与此类似，但由于技术欠缺，钢轨产量和质量一直达不到设备的设计能力，连德国厂家也难以调出合适的钢轨孔型。因此，他们希望包钢集团能够派出技术专家，给予技术指导。

包钢诞生于上世纪中期中国“大炼钢铁”的时代，是

新中国最早的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其一号高炉出铁由周恩来总理剪彩。包钢多年来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技术和软实力输出恰恰也是包钢集团近几年在调整结构和产业创新过程中非常重视的方面。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包钢轨梁厂派出57岁的技术中心副主任井溢农与印方对接，这位于1983年毕业于包头钢铁学院轧钢专业的“老包钢人”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行业技术专家。从去年11月份开始，井溢农带领团队先后四次前往位于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赖加尔小城，协助印方进行了轧机孔型修改和加热器重新设计，顺利完成



2017年2月下旬，井溢农（右三）在印度金达莱钢厂和对方探讨技术问题。



了月产3、4、5万吨的调试约定，并于今年4月全部结束此次技术服务。

技术合作过程中，两家钢厂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与了解。金达莱人员惊叹于包钢集团一尘不染的厂房、清洁度极高的高炉出铁口和先进的环保系统，井溢农则对于金达莱钢厂一年建成两座4500米巨型高炉和自觉的环保意识赞不绝口。

当下，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全球经济变革，而且这一倡议已从顶层设计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包钢集团与金达莱集团的这次突破性跨国技术输出，无疑将为致力于培养国际合作精神的

包钢薄板厂的无取向硅钢退火生产线于2014年7月投产，结束了包钢没有硅钢产品的历史。硅钢被誉为“钢铁中的艺术品”。





位于包头市北部的白云鄂博矿区是包钢集团的主要原料基地，那里蕴藏着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 18% 以上的稀土矿物。图为包钢稀土钢铁厂。

“一带一路”新开放战略积累微观层面的有益经验。

促成此次合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包钢集团的产品多年来在印度口碑良好。大约从2010年开始，包钢就有产品出口印度，最初多为粗放类的圆钢、钢坯和普通无缝管，从去年开始，高端产品逐渐增多。就在今年年初，包钢集团第一次向印度出口了近两万吨管线钢中厚板，这种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将用于印度新德里周边地区的输油项目。

世界钢协于去年11月在孟买召开了亚洲市场会议，其报告专门分析了“印度是否会引领全球增长”。受制于全球经济低迷，国际钢材市场增长缓

慢，唯有印度被众多分析人士视为难寻的引擎和亮点。虽然这份报告提示要特别注意“印度全国并非一个增长速度，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巨大”，而且指出印度GDP总量中的投资份额在减少，但仍然肯定印度经济和钢材市场的基本面向好。

包钢集团虽为中国内陆企业，其产品出口比例却相对比较高，占公司产量的10~15%，在中国内陆钢企中出口量能排进前十名。包钢集团国贸公司总经理刘玉峰负责海外市场开拓，和井溢农一样，他也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包钢人”。在刘玉峰看来，虽然印度近年钢材消费量仅为中国

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其处于高速增长轨道，人均钢铁使用量很低，现任政府又积极推动多项改革，因此市场潜力很大。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虽然包钢集团的传统海外市场在欧美和东南亚，但也一直在跟踪印度市场。

“印度正好和中国发展错开了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4.0和大规模城镇化阶段，印度工业化还在起步。我们在限制钢铁产业发展的时候，印度正在大力发展钢铁产业。”2015年，印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产钢国，国内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和印度国内的钢材产品相比，包钢产品除了规格多品种全，钢材中的珍贵稀土元素成为最大优势。包钢集团地处中国北部省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稀土金属储量，而含有稀土元素的钢材更具韧性和塑性，青藏铁路超过75%的重轨因此都来自包钢。

物流对于不少内陆企业来说都是出口的瓶颈，包钢也不例外。其产品通常从天津港起运，到迪拜港口需要35天左右，期间市场变化的风险非常大。刘玉峰非常期待“一带一路”建设中连接亚洲各次区域和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如果我们去往中亚和南亚的货物能从内蒙到新疆喀什，再通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运出，几乎可以省去一半路程。这不仅可以规避市场风险，货运方式的改变也可以让包钢更多类型的优质产品走出去。”

去印度建电站

文 / 张雪

印度电力短缺让中国企业看到了机遇，中国企业以高质量工程赢得了口碑，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外国电站工程总承包商。

在孟加拉湾西岸，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南部的古德洛尔市向南25公里，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承建的古德洛尔燃煤电站工程就坐落在这里。该项目已如期交付业主，发电主

供安得拉邦海德拉巴市和特伦甘纳邦，极大缓解了以上两个邦用电紧缺问题。

山东电建三公司自2005年进入印度市场以来，先后在印度5个邦以工程总承包方式承建

了6座大型电站，装机容量超过10770兆瓦，占印度整个火电市场份额的5.7%，合同金额超过73亿美元，累计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40000多个，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外国电站EPC总承包商。

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印度最大的外资电站——嘉佳电站于2012年正式运营。



深耕印度市场结硕果

段连斗是山东电建三公司印度区总裁，同时兼任印度古德洛尔燃煤电站项目经理。

2006年，段连斗第一次来到印度，担任公司位于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Bikaner市的马鲁喇1x135MW循环流化床电站的项目经理。他用“两眼一抹黑”来形容当时的自己。

海边出生，长期生活在海边城市的段连斗第一次感受到了沙漠的酷热干燥。他告诉记者，2000年，公司第一次提出海外发展战略，虽然当时还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很快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2002年，公司第一次在尼日利亚接下海外订单，随后不断扩展海外版图。2005年，公司正式进军

印度市场。

段连斗意识到，只有主动适应海外工作模式，积累海外工作经验，才能开拓一片新天地。接下来的11年里，从印度西北的沙漠腹地，到东南部的孟加拉湾，段连斗从没离开印度，也成为了公司里名副其实的“印度通”。

对于公司如何能在印度站稳脚跟，段连斗的回答是：“我们的方案拥有更高的性价比，能为业主带来高回报，同时中国公司有更强的执行力。”

关于刚刚交付使用的古德洛尔项目，段连斗介绍说，机组在施工和调试完成后，会进行的试运行工作，该机组从锅炉点火开始到试运行完成，是一次性高质量完成的，中途没有因出现技术或质量问题而停机消缺，压力管道或部件也没有发现任何泄露。对此，古德洛尔项目电厂的一位印方业主负责人竖起了大拇指。他认为，这是他以前参与过的许多新电厂中质量是最好的，从点火到启动一次性通过的还从未见过。

过硬的工程质量为公司赢得了口碑，该业主明确表示将与山东电建三公司在印度古德洛尔电站二期工程继续深度合作。

印度政府在2015年底对其环保法规进行了修订，大幅降低了排放限值。这对火力发电厂烟气处理装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脱硫、脱硝和除尘装置。

早在2012年，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并正式投入运营的印度嘉佳发电厂已经达到了该要求。印度嘉佳发电厂是印度



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南部古德洛尔的古德洛尔燃煤电站运行控制室。

第一个设计脱硫装置的火力发电工程，硫排放量几乎为零，也是印度首个环保电厂。该项目成为中国企业境外火电工程的重要里程碑项目，获得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高奖——2012年度“杰出基础设施奖”，2013年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和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全国优秀焊接工程奖等。

本土化战略

在山东电建三公司，像段连斗这样长期工作在海外的员工大有人在，海外战略的实施，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为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人力保障。

另一方面，本土化战略离不开本土化人力资源的支持。本土化战略既能让公司节约成本，又能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化公司的选择。

段连斗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的印度员工与中国员工的



比例已经由初来印度时的1:1上升为3:1。为了让印度员工能更快适应工作，公司有时会采取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培养模式，一名中国工作人员带领两到三名印方工作人员。这样印方员工更快地熟悉了工作流程，快速成为“行家里手”。

在山东电建三公司的项目营地，设有中餐和印餐两个食堂，初衷是为了尊重员工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在生活上也感受到平等。但时间长了，段连斗发现，在中餐食堂里可以经常看到印度员工的身影，中国员工也常常去光顾印餐食堂。

35岁的安全主管库马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工作，他从印度北方的哈里亚纳邦来到了位于南部的工程施工地。他在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说：“我从这

个项目中学到了非常多。这一工程的安全标准非常高，能在这里工作我感到非常满意。在这里我不断地自我激励，增强了自信，学会了如何处理一些问题，对我来说在这里工作非常好。”

“越来越多的印度员工对企业有了归属感，很多员工会跟我们一样，随着公司的项目不断迁徙，干完一个工程会跟我们到下一个工地接着干。”段连斗还告诉记者，公司会给印度员工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已有部分优秀的印度员工来到位于山东青岛的公司总部工作，还有一些被派往中东等地区参与公司的海外项目。

中印电力合作前景无限

印度作为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电力短缺一直制约着其经济发展。可以

预见，“印度制造”计划的提出，将让印度未来的电力需求有爆发式增长，而经常不期而至的断电严重影响了外国资本投资印度的信心。

莫迪连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该邦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供电，是印度为数不多的“不缺电”地区，因此，莫迪上台，印度民众给予了他很高期望。近年来印度电力工业的高速发展，为电力建设带来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我打算深耕印度市场了。”段连斗对印度市场很有信心。他坦言，近几年印度电力建设市场有些低迷，表面上电力生产过剩主要是因为印度电网建设落后，很多地区没通电，实际上印度的电力缺口明显。

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印证了段连斗的观点。报道

2011年，印度贾苏古达项目二部向社区小学捐赠学习生活用品，并与学生联欢。





印籍员工感受中国文化——包饺子。

“到2031年，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8%，印度需要增加能源供应三到四倍，电力需要增加五到六倍。”

称，在印度，目前还有3亿多人口过着没有电的生活，他们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莫迪总理当选一年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度还有超过1.8万个村庄未能通上电。

根据印度规划委员会估算，到2031年，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8%，印度需要增加能源

供应三到四倍，电力需要增加五到六倍。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而已经在海外市场打拼多年的山东电建三公司并没有原地踏步。段连斗告诉记者，公司除以工程总承包的方式承

建工程外，同时也会参与部分项目投资，希望未来在电站的后期运营管理方面也能做一些有益尝试，拓展企业经营领域。

2015年5月16日，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上海，他召集了“25人中国企业家圆桌会”，参会的企业包含了特变电工、哈尔滨电气集团、东方电气、海润光伏、天合光能等多家电力能源企业。如今，这些企业已经陆续在印投资，部分企业已开始建厂生产设备，由此可见，中印在电力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印度制造” 能否拥抱“一带一路”

文 / 岳朝敏

“印度制造”若能同“一带一路”对接，印度必将受益。

“印度制造”是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不久顺应时势推出的印度国家发展计划，旨在推动印度成为全球设计和制造中心。莫迪上台时值印度经济增长率跌至10年来的低谷，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印度制

造”计划的横空出世为阴霾中的印度经济点燃了希望，该计划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承诺大大增强了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力，使得印度在2015年迅速拔得头筹，荣登全球“绿地项目资本投资”排行榜首，首次

超过中国成为全球资本投资头号目的地。

2015年印度的经济增速也同时首次超越中国，尽管不少专业分析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印度调整了GDP计算方法以及基准年份，但毋庸置疑的

印度普曼迪花市上的小姑娘躺在制作花环用的橙色金盏花中。普曼迪花市是全亚洲最大最主要的花卉市场。REUTERS



是印度正力图以振兴制造业为基石，带动印度经济腾飞。

“印度制造”：承载着印度的大国梦想

“印度制造”不仅仅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它实质是对过时程序和政策的一次全面而前所未有的修正和革新，代表了印度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即“小政府，大治理”。作为一项庞大的经济革新计划，“印度制造”以四大新“基石”为支撑，即新思维、新管理程式、新基础设施、外资投资新政，其宏大的架构和愿景不仅彰显着印度全面崛起的雄心，更是承载着印度人的大国梦想。

自尼赫鲁提出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可以说“大国愿景”始终影影绰绰指引着印度人前行。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印度震惊失落，中国在大国之路上快速崛起时，“龙象之争”之说被一些善于观察的西方学者不失时机地推出，并长时期作为热门议题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印关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定义中印关系的基调。

西方学者分别用温和迟钝的大象与张牙舞爪具有强烈攻击性的龙指代印度和中国，是深层潜意识里“中国威胁论”的某种投射，而“龙象之争”则事实上成为了印度版的“中国威胁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崛起程度与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隐约呈现出某种正相关。印度作者拉维·韦卢尔在其新书《印度崛起》中指出，印度



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一位正在纺织厂工作的印度工人。CFP

“‘一带一路’带给印度的‘深重危机感’，与其说是源于腾飞的‘中国龙’带给印度的外在‘威胁’，倒不如说是源于印度对自身缺陷和对‘印度式增长率’的不自信与焦虑。”

可能从中国的快速崛起中获得的最大好处之一在于“为印度的改变扫清道路”，中国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新德里所需的提醒信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成了印度的最新“信号”。

“一带一路”：机遇还是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印度各界夹杂着警惕、质疑、观望和争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学界从经济、战略、安全

等角度对其动机进行解读，而从印度政府层面反应来看，其思路与学界不谋而合。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员拉合尔·米什拉的观点，他认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存在不同的战略目的，前者更多是基础设施建设，与欧亚大陆国家、中亚以及西亚互联互通；而海上丝绸之路更多是中国想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印度在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事务上积极支持中国倡议，但对“一带一路”倡议却顾虑重重。拉合尔·米什拉认为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了印度“非常深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主要源自于中巴经济走廊。印度即便出于经济动因愿意搁置边界争议而搭一程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可一旦带入巴基斯坦议题，一切就将陷入纠结无解。

历史事实表明，制造业是支撑大国崛起的基础，而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再次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一些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全球制造业正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业布局洗牌。中国传统制造业正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的发展模式向主要依靠

知识和智力资本及创新等高级要素的发展模式升级，这就为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腾出了发展位置 and 空间。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先前做出的预测，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将有希望成为接棒中国的“潜力五国”，其中，印度最有希望成为低成本制造业下一个主要枢纽。

尽管印度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接棒中国的下一个制造业中心，然而印度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三十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基本不可能复制中国的成功经验。

首先，印度长期以来奉行的精英教育理念致使教育两极分化，基础教育严重不足，文盲人口保守统计也有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劳动力素质低下。

尽管有着全球最庞大的廉价年轻劳动力，但是现代制造业需要的有专业分工的熟练劳动力却十分短缺。在联合国2016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中，印度仅排名世界第105位。

其次，包括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物流仓储、公共服务等在内的落后基础设施大大抵消了由各项低成本要素产生的优势。

再则，印度庞大的人口确实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数量庞大的边际劳动力和低质量就业制约着市场消费能力，导致印度消费市场大而不强。

此外，印度改革必须逾越的三座大山目前仅有税收制度一项获得突破，其成效如何尚需检验。而另外两座大山——劳动法 and 征地法却未能取得实

印度手工业承载着传统文化价值，但手工业组织分散，生产方式落后，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和国际竞争的冲击下，整体处境堪忧，正处于痛苦的转型过程中。CFP



质性进展。除了法律制度的束缚，印度还存在着经济结构痼疾、宗教和社会文化问题、政府低效等种种制约因素。同时，国际上一股正在上升的“逆全球化”趋势也很可能成为严重的外部制约因素。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随着全球技术的升级，世界正进入机器人技术的高速增长期，机器人的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对人力劳动依赖程度的减少，这将显著冲击低成本劳动力产生的竞争优势。

当然，按照目前的预测，未来15-20年，低成本制造业很难摆脱对人力依赖，这也是留给印度释放其“人口红利”的时间，印度若不能很好地利用这十多年时间，其潜在的“人口红利”很可能转变成危险的“人口炸弹”。

融入还是竞争：一个两难的选择

印度对自身的危机具有相当的清醒认识，因此，“一带一路”带给印度的“深重危机感”与其说是源于腾飞的“中国龙”带给印度的外在“威胁”，倒不如说是源于印度对自身缺陷和“印度式增长率”的不自信和焦虑。

“一带一路”是国际经贸合作的一种新架构，而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若能将其国家发展战略“印度制造”同“一带一路”对接，必将成为大赢家。“一带一路”能为“印度制造”提供急需的资金、技术、经验，从而能帮助印度释放“人口红利”、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为“印度制造”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共赢。

然而，当印度看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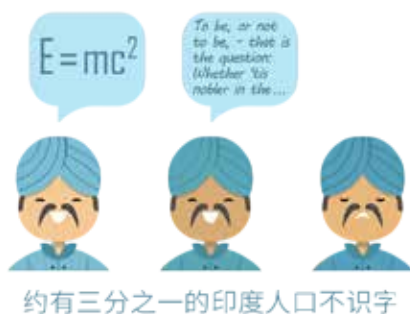


2016年4月18日，美国纽约，印度财政部长Arun Jaitley在亚洲协会会议上发表“印度制造：新方向”主题演讲。IC

带一路”时，却发现中国是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坐在舞台中心，这似乎又刺激到了印度“多刺的自尊心”。“印度制造”的标志选择了由众多齿轮组成的更有攻击性的狮子，而非温和的大象，暂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印度视角下“龙象之争”向“龙虎斗”的演变，从印度分别从海陆两线加紧同周边国家增强合作和联系的各种行动计划来看，除了基于传统思维的利益和安全考量，“另立山头”从而获得主导权、话语权也是揣着大国情怀的印度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尽管印度并不明确支持接纳“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但这并不影响它将“一带一路”的“有益部分”嫁接到“印度制造”的宏伟计划中去，但“印度制造”计划若舍本求末，坚持以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为指导，其终究难以承载起印度的“大国梦想”。

本文作者岳朝敏为四川省社科院印度研究中心秘书长。



印度仍然缺乏现代制造业所需的熟练工人

“印度制造” 如何吸引外国投资

文 / Ranjan Mukerjee

印度飞速发展的制造业已经赢得了全球关注，但外国直接投资在是否要进入印度这个问题上仍旧犹豫不决。

2014年印度大选期间，候选人之一纳伦德拉·莫迪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就包括将印度发展为全球制造中心。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印度目睹了中国产业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制

造业发展，中国也由此成为了全球出口大国。与此同时，印度虽然花了很多心思来吸引外商投资其制造业领域，却收效甚微。莫迪和他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希望扭转这种趋势，所以

将“印度制造”作为其竞选宣言中的关键任务加以推进。

2014年9月，在成为印度新任总理仅四个月后，莫迪便推出了“印度制造”计划。此计划得到了印度民众和工商

莫迪以“印度制造”战略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来印度制造，在全世界销售。图为芬兰总理 Juha Sipilä 于2016年2月在孟买举行的“印度制造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IC



业界的热烈欢迎，也赢得了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毕竟，这就是莫迪所承诺的变革：“印度制造”计划有望成为推动印度制造业走向辉煌的“灵丹妙药”。考虑到莫迪总理的个人背景及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经验，人们对“印度制造”寄予厚望完全合乎情理。

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便以“重商”而著称，尤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更被人誉为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不少日本公司被吸引至古吉拉特邦投资，特别是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必须注意的是，就投资金额来说，古吉拉特邦看起来并不像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热门地区。来自印度储备银行的数



日本本田摩托车 Narasapura 工厂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去年年产量为 240 万辆。图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工厂员工在检查新出厂的摩托车。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两轮车市场，本田公司认为在印度投资本土工厂给公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C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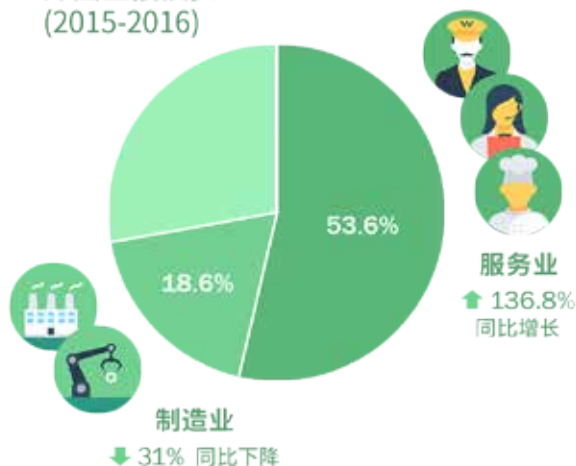
字显示，2000年至2011年期间，古吉拉特邦仅吸收了72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同一时期，其邻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458亿美元，德里国家首都辖区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260亿美元。

然而，对古吉拉特邦这样一个以前长期被外商忽视的地区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确有了实质性的增长。随后，莫迪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经验推向了印度全国。

宣誓就职后仅几个月，莫迪总理就旋风般地踏上了外访之旅，行程跨越数个大洲。尽管他会见了不少政界领袖，但这些访问活动的主要目的却是与工业巨头进行交流，例如他曾经与硅谷各大公司的领袖进行了闭门会议。每次出访均被认为十分成功，给印度带回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意向协议。

但是，这些投资到底对“印度制造”产生了何种效果？

外国直接投资
(2015-2016)





数字不代表一切

事实证明，真实的情况并未完全得到反映。根据印度政府最新发布经济调查数据，印度目前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流入额达到了750亿美元。这个数字引人瞩目，大约与中国经济增长繁荣期（即2000年至2005年）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平均额持平。

然而，这些仅仅是签在协议上的投资数字，真正最后落实的实际投资额要少得多。比如说，从2003年到2011年，两年一次的“活力古吉拉特”全球投资者峰会签订外国直接投资谅解备忘录，总数额高达8760亿美元。同一时期，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是6000亿美元。然而，在现实中，古吉拉特邦在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上不仅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甚至必须奋力才能争取在印度国内各邦中不至落后。

现在“印度制造”计划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莫迪总理每次出访，都能签回许多谅解备忘录。但最后能落实的项目数量却大幅缩水。如此低的“转化率”会成为“印度制造”计划前进过程中的绊脚石。此外，按行业看，服务业仍旧是印度最受外资青睐的领域，将“印度制造”计划中的核心行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从2015至2016年间，印度服务业吸引的外资占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6%，同比增长近137%。相比之下，制造业吸引的外资仅占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8.6%，同比下降31%。除了汽车业（2015至

2016年，吸引外资25亿美元）以及制药业（2015至2016年，吸引外资15亿美元），“印度制造”计划并未引起外国投资者太多的兴趣，制造业也开始感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

任务太多，推进太快

毫无疑问，“印度制造”计划推出的时机是恰当的。在中国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消费驱动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待于填补的真空地带。在“印度制造”吸引外资的初期阶段，印度的人口红利和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常被吹捧为其主要加分项。毕竟，这些因素之前都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然而，以下两个原因却妨碍了“印度制造”计划的顺利推进。一是印度极其缺乏熟练



2017年2月4日，塔塔公司路虎第二经销店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开业典礼。早在2008年3月，印度塔塔公司以23亿美元收购捷豹与路虎。有评论认为，印度将在未来十年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中心。IC

工人，二是官僚制度的繁文缛节，大大提高了在印度经商的难度。

对任何想要投资印度制造业的国际公司来说，这些因素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在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营商便利指数”排行中，印度位列全球第130名。尽管在“印度制造”计划的框架下，印度出台了许多新的规划和政策以改善经商环境，却还是未能形成能将其发展为制造中心的理想氛围。最近，埃隆·马斯克（译注：环保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创始人兼CEO）拒绝了印度政府的提议，这透露了在印度制造业领域将投资谅解备忘录转换为落地项目存在巨大困难。尽管印度政府已经大张

旗鼓地铺开了欢迎的红地毯，特斯拉却一直犹豫是否要将印度作为其南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制造和出口中心。“印度制造”尽管可能成为响亮的口号，透露出的信息也很乐观，但涉及到外商直接投资这一问题，抢跑太多、推进太快反而给印度带来了负面影响。

希望犹在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印度制造”计划已经失败，无疑也是荒唐的。目前，外国直接投资还在继续流入印度，其中很多将会流向“印度制造”的核心行业。

这一领域的外商投资可能不会以官方希望的速度增长，但即使如此，有进步总比没进步好，前景还是充满希望的。印度正在大力推行相关措施，以确保青年人能够具备现代制造业所要求的技能储备。同时，印度正大力减少行政手续的繁文缛节，强调在印度经商没有麻烦且相当便利，从而让外国投资者放心经营。这些政策要想产生明显效果，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怕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印度制造”计划已经失去动力。就目前而言，应该说缺乏外国直接投资对“印度制造”最大的影响，就是给这个计划敲响了警钟，提醒着印度做出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了。

本文作者 Ranjan Mukerjee 现居孟买，自由撰稿人，写作范围主要涵盖商业和管理。

2017年4月11日，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TAL制作的Brabo机器人在印度孟买发布。这是印度本土生产的首批工业铰接机器人。CFP



“一带一路”三年进展图

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一带一路”建设三周年进展报告》

编辑 / 胡周萌

设计 / Andrey Maleev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来，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同4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500亿

美元，一系列项目逐步落地，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各国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带动亚欧大陆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2013年3月13日，山东电建三公司印度蒙德拉项目的中印员工在施工现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9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框架

“一带一路”建设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政策沟通

有效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有助于培育政治互信，建立合作共识，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贸易便利化及多边合作体制机制的建立。中国与沿线国家不断落实各项规划与项目，有力推动了区域与跨区域合作。

双边合作进展

在“一带一路”沿线

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战略对接

光明之路（哈萨克斯坦）



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



草原之路（蒙古）



容克计划（欧盟）



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英国）



欧亚倡议（韩国）



两廊一圈（越南）



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琥珀之路（波兰）

多边合作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SCO）



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10+1”



亚太经合组织（APEC）



博鳌亚洲论坛（BFA）



亚欧会议（ASEM）



亚洲合作对话（ACD）



亚信会议（CICA）



中非合作论坛（FOCAC）



中阿合作论坛（CASCF）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



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



设施联通

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网络联通、能源基础设施联通和畅通信息丝绸之路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共同建设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 雅万高铁
- 中老铁路
- 中泰铁路
- 匈塞铁路
- 土耳其东西高铁
- 瓜达尔港



中国已开通中欧班列共计**39**条，
累计开行近**3000**列，
计划到2020年实现开行约**5000**列。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新建
机场**15**个、改（扩）建机场**28**个。

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签署和建设的电站、
输电和输油输气等重大能源项目多达**40**项，
共涉及**1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由中国移动牵头研发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
成为两大主流4G国际标准之一。
TD-LTE已在**47**个国家部署了**85**张
商用网络，用户数全球占比50%。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牵头加快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项目传输系
统建设，加强国际陆缆
和国际海缆建设，完善
国际基础网络布局。



中国企业与罗马尼亚、英国、巴
基斯坦、阿根廷开展了核电合作。



中国企业与安哥拉、巴西、尼泊尔、
巴基斯坦、阿根廷开展了水电合作。



贸易畅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致力于推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加强双边投资保护
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逐步消除各项贸易和投资壁垒，
为区域内各国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双多边贸易便利化



中国已对外签署自
贸协定**14**个，涉及
22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
韩自贸区谈判，开展亚太自贸区
联合战略研究。

共建合作平台

中国在沿边地区设立：

- 边境经济合作区**17**个
-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5**个
- 跨境经济合作区**1**个，在建**11**个



投资便利化

中国已与**104**个沿线国
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设立**56**个境外合作区。

资金融通

中国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际金融机构展开跨境金融合作，以满足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拓展沿线国家及其他经济体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和投资信贷等业务，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同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金融合作

国际开发性多边金融机构

亚投行



- 总部：北京
- 2015年12月25日成立
- 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6年6月25日，亚投行批准了首批四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的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

丝路基金



- 注册地：北京
- 2014年12月29日成立
- 注册资本为**615.25亿人民币**

2015年4月20日，丝路基金、三峡集团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共同签署《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是丝路基金成立后的首个对外投资项目。

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

- 总部：上海
- 2015年7月21日成立
- 注册资本 **1000 亿美元**

2016年4月2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公布了总额为**8.11亿美元**的首批贷款项目，支持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绿色能源项目。

中国国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国家开发银行



已建立涉及超过**60个国家**、总量超过**900个项目**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储备库，涉及交通、能源、资源等领域。

中国进出口银行



有贷款余额的“一带一路”项目**1000多个**，项目分布于**49个**沿线国家，涵盖公路、铁路、港口、电力资源、管道、通信、工业园区等领域。

商业银行

9
56

截至2016年3月31日，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56家**一级分支机构；

来自**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家**商业银行在中国设立了**7家**子行、**18家**分行以及**42家**代表处。

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人民币跨境使用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超过**2.63万亿元**。



央行货币合作

截至2016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境外**3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者其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其中**21个**国家和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建立人民币清算体系

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已拓展到**20个**，其中**7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金融监管合作

截至2016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9个**境外反洗钱机构正式签署金融情报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银监会已与**2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合作换文；

中国证监会已与**59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签署了**64个**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民心相通

中国积极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文教合作、旅游合作、卫生医疗合作、科技合作和民间合作等。

文教合作

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专业技术人员。

中国与沿线国家举办了**19次**“国家年”活动，设立了**25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立了**134个**孔子学院和**130个**孔子课堂。



近一半在华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旅游合作

中国同相关国家互办各类“旅游年”**9次**，举办旅游周、旅游推广周、旅游月等各类推广宣传活动达**130余次**。



据国家旅游局预计，2016至2020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2000亿美元**游客旅游消费；

中国将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游客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



卫生医疗合作



中国已与中东欧、东盟、东盟等地区或国家的卫生部、医学院等部门展开了医疗人才培养、公共卫生服务和传统医药等方面的合作，已签订国家级协议达**23个**。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56项**涵盖航天、能源、生态等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建立了“一带一路”智慧园区、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产业合作中心、新产品孵化中心等一系列科技中心共计**38个**。

科技合作

民间交流

在青年交流方面，中国同相关国家已互办青年交流年活动**8次**，推出了**9项**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在文化传媒方面，中国参加了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外媒体高峰论坛等**35项**重要会议。

在公益环保和减贫开放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展了包括世界防治荒漠化“一带一路”共同行动高级别对话、青少年和和平友好国际联盟、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等**26项**活动。

在智库交流方面，中国智库就“一带一路”主题组织了中国伊朗智库对话、中国土耳其智库对话、中国哈萨克斯坦智库对话、中美智库对话等活动**29次**。



若无特别说明，以上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16年6月30日，部分数据有补充和更新。

我最喜欢的中国 / 印度电影

策划执行 / 《中印对话》编辑部



我眼中的《大地之歌》

文 / 杨舰

我最喜爱的印度电影名为《大地之歌》。《大地之歌》是萨蒂亚吉特·雷伊拍摄的“阿普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了一个没落的婆罗门家庭因为贫穷而走向破碎的悲剧故事。

电影中一家人住在破旧有待修缮的房子里，吃不了两顿饱饭，但好在母亲勤俭持家，维持着生活基本的体面。随着阿普的出生，父亲得到了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并向妻子许诺一切都会变好。几年过去了，阿普长大，长女朵佳也到了出嫁的年龄。家庭的状况却

依旧没有改善，母亲日复一日辛苦操劳着。为了还清借债，父亲外出寻求工作机会，而之后却长久地失去了联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母亲在几个月后彻底绝望，只得依靠邻居的施舍勉强度日，这时候大女儿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旧患复发，祖上的房子也因为连月的大雨被冲刷得破败不堪。而父亲带着油盐衣被归来的早上，得知了女儿已过世的消息。丧女之痛让父亲作出决定：带着家人离开这片土地。

这部印度电影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讲述贫穷，却没有刻意去讲贫穷给人带来的深重苦难，而是以“阿普”和“朵佳”两个小孩的视角去看待他们面对的贫穷，并从中寻找乐趣，他们是在苦中作乐。在影片中，贫穷是一个放大镜，而不是一块遮羞布，而这个放大镜把这些卑微的脆弱的人心看得更加清楚。

在这部电影中，我还看到了印度女性意识的觉醒。母亲曾在黑夜里丈夫酣睡的时候自言自语：“你不在的时候，有时我会觉得很沮丧。你不会了

解这些事情的。我也有梦想，所有事情我也可以做。”

电影中母亲出身贵族，却不得不终日为柴米油盐操心，为孩子偷了邻人几个水果吵嘴，为了几根辣椒跟寄宿的姨妈计较，她有她的尊严，最后却因为生活的贫困变卖了自己的嫁妆，住在破败的房子里不受人接济几乎不能过活。

这部电影是1955年拍的，印度人在那个时代就能把目光聚焦在一位被贫穷压得直不起腰的母亲的心底梦想上面，并把这个可怜的人当作勇敢的人来看待。从中，我能看到的是心怀怜悯的印度人对他们祖国的爱和体谅。





印度电影众生相

文 / 王依妮

提到印度，我脑海中浮现出最多的，就是一幕幕印度电影中的情景。

比起发达国家电影很多故弄玄虚下掩盖的精神空虚，印度电影扎根于那片古老而拥挤的土地，似乎总有丰富的话题可以讨论。我所看过的印度电影，主题几乎都是围绕着当地残酷现实导致的心理状态：大部分执迷，一些无所谓，却又有一点乐观。讨论内心压抑已久的渴望时，绝不脱离社会环境，只是呈现在印度人们自然而然形成的精神世界；而讨论在观众看来绝望的、透不过气的现实时，又总是仅仅摆出事实，从不指责，好像在静静的讽刺，又好像仅仅在诉说那寥寥几个毕其终生想要实现的心愿。我想，正是因为把握住了这一点，印度电影屡屡用其真实感震撼着我的内心。正如《Parched》，触目惊心的贫困，印度底层女性的遭遇和

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在一缕缕觉醒下微微撼动的意识惯性，无不激发我的恐惧、怜悯和反省。又如《3 idiots》，为一个理想中的完美形象铺垫了那么多，看得人不免失望时，却突然回归真实的竞争压榨下的世界，让人感慨在恐惧或伪装的驱使之下仍能主宰自己更加可贵。再如《Guzaarish》，印度电影中少有的理性派，又与印度几乎无关，甚至想深究理解与孤独，但仍无脱节感，能让人感同身受，看后也会感到内心平静，而不会感到飘渺迷茫。

印度电影的结局也都常常是喜剧性的，不会习惯性地传达给观众底层的苦，中

产的烦，富豪的无聊。永远不说“没办法”，是不变的哲学。哪怕是穿插在其中本意增加“诚意”的歌舞，也并非鸡肋，而总是流露着天性中那股实实在在的快活劲儿，给人想和他们一样追求快乐生活的动力，哪怕只是片刻。印度电影几乎从不概念化、理想化、追求深刻，很多都是简单的一元论的中心，就像一个实在的好友有无尽的朴实的话要说，只是发自肺腑地表达想要倾诉的，就足够让人产生共鸣了。也许想仅从电影中管中窥豹了解印度远远不够，但总能给人感动与启发的印度电影，正引人一步步地走近印度，对印度寄予理解与期待。





《一个都不能少》与人性的光辉

文 / Shibesh Mehrotra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有一个情节：记者采访代课老师魏敏芝时，询问她为什么花费那么多时间寻找张慧科——一位到城里找工作但后来却不知所踪的学生。为什么她那么在乎？魏敏芝一时无法作答，但当记者让她对着镜头，向有可能在观看这个节目的张慧科说些什么，她终于绷不住了。泪水从她充满绝望的眼中流下。她哽咽着恳请她昔日的学生回来。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在乎，但就是对学生无法割舍。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15岁，觉得这段情节明确表达了对做事须有“值得的理由”的观点的驳斥。

对于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来讲，做每件事都是值得的。在这部电影中，人物只是服从于毫无意义的指令或者本能去做事，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思

考，去分析那些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概念。

当很多人批判电影中的助理和警卫的官僚作风时，我看到了剧中的人们其实和那个教了26个学生的13岁的代课女教师一样无知、缺乏经验。魏敏芝带的学生数量是她年龄的两倍。这些学生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教育，只是掌握了最基本的知识，以求能够有一个比他们的父辈光明一些的未来。在这部电影中，没有人能奢望有机会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

然而这个看似凄凉的场景中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从中我们学会了关怀。剧中有个情节，张慧科阅读了班长的日记，大家才了解到，高老师之所以教他们要珍惜每一块粉笔，是因为这些被张慧科和魏敏芝他们当作理所当然的粉笔，竟然是降低对课桌的材质要求，以此省下一些钱，然后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电影中还有这样一段情节：为了帮助张慧科回家，整个班级斗志激昂，纷纷运用学到的数学知识，计算需要搬多少块砖、搬多少天，才能够赚齐张慧科和魏敏芝的车票往返的费用。每个人都绞尽脑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情节十分出彩，它深化了电影的核心：只要你真正在乎，奇迹就会发生。

因为在乎，小女孩会懂得去珍惜一支粉笔。因为在乎，教室里不算聪明也不爱学习的孩子们会一起解决复杂的数学题。因为在乎，基本身处官僚体系内部的人们也会为你惊讶和改变，腾出电视黄金时段帮你寻找伙伴。因为在乎，整个城市同心协力，为一所他们从未听说的贫困学校的改造提供帮助。

《一个都不能少》这部电影教会当时还是十几岁孩子的我，为什么人要有一颗充满关爱的心。





《英雄》： 探索“真理”与“牺牲”

文 / Freyan Patel

张艺谋执导的武侠电影《英雄》（2002）是一部平衡艺术与武打元素电影。它将音乐与武术（武术、音乐遵循相同的原则：两者都有着复杂的配合和罕见的旋律）、剑术与书法（书法和剑术同理，精髓在于挥洒自如，两者都强调回归初心）融合在一起。但最重要的是，《英雄》是一场对“真理”和“牺牲”的探索。

电影一开场，主角无名（李连杰饰）被带到专横的秦王（陈道明饰）面前。秦王为统一天下，树敌无数，其中赵国刺客长空（甄子丹饰）、飞雪（张曼玉饰）、残剑（梁朝伟饰）三人最为秦王忌惮。无名称已经杀死了这三名刺客，获得了于百步内面见秦王的机会，来讲述他的故事。作为杀

死长空的奖赏，无名可于20步内晋见秦王；作为击杀残剑、飞雪的奖赏，无名可于10步内晋见秦王。但若再向前一步，他就会被当场格杀。

无名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不同的色彩：笼罩着灰色阴影的刺客长空的死亡，和萦绕在鲜红色中的残剑和飞雪的爱恨传奇。相比之下，秦国宫廷中的色彩则十分鲜明。秦王认真地听着无名的故事，但却认为他在说谎，实际上是勾结刺客企图接近自己十步之内行刺。随后，秦王讲述了自己想象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色调是象征着真理和智慧的蓝色。最后是秦王和无名之间的言辞交锋，双方不断改变着故事情节，让人真假难辨。他们所揭示的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特有的色调。

这种视觉效果通过电影高超的特效得以展现。电影的每一帧，我都想截下来作为自己的客厅的装饰。尤为出彩的几幕包括无名和长空之间的对决、如月（章子怡饰）和飞雪在红色背景中打斗以及残剑和无名在湖面上的决斗。就演员演技而言，李连杰扮演的无名无可挑剔。尽管戏份不足20分钟，甄子丹的表演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认为演员中表现最亮眼的是饰演秦王的陈道明，他的角色在可怕的暴君和脆弱而孤独的统治者之间转换自如，让

我不由地开始同情他。另外还有梁朝伟和张曼玉这对完美的荧幕情侣，两人都深谙通过轻描淡写的表演刻画人物。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他们在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的表演，你也一定会喜欢他们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英雄》是一件艺术品，梁朝伟和张曼玉纯熟的演技让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既能与电影融为一体，又能从所有演员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仿佛都经过深思熟虑。无论是作为一对情侣还是独来独往的刺客，飞雪和残剑似乎都在共舞。他们的故事甚至比主角无名的故事更能触动我。

我十分喜爱《英雄》这部电影。与其说它是一部武打片，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首流动的诗歌。对于我来说，这部中国电影是美学与哲学的狂欢。正如资深电影评论家Roger Ebert说，“其暴力因素只是偶然”。



印度人在中国

策划 / 《中印对话》编辑部 采写 / Nick Lanigan

提到中印两国，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政治？贸易？还是经济？没错，这些都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或许更重要的是两国普通人的友好往来和一个个动人的友谊故事。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究竟过得怎样？对于曾在两国生活过的人来说，中印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生活在中国的普通印度人对于计划来中国的印度人会给出哪些建议？为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印对话》团队特别策划了“印度人在中国”专题，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

尼泰什·卡萨那：美食之旅

尼泰什·卡萨那来自新德里，目前在北京DELSK公司担任印度市场运营总监。他背井离乡，跨越千里，在中国这个语言、风俗和文化都与自己家乡风格迥异的国度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职业天地。

当问及中印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给出答案：“绝对是食物！两国的饮食无论在味道和食材方面都千差万别。中国人偏爱吃肉，而印度人则偏爱素食。”当然，现在的尼泰什也逐渐适应了中国食物，他表示：“在北京生活

两年后，我已习惯并爱上了中餐，但仍然十分想念印度餐，这也是我经常自己在家做饭的原因之一。”

据尼泰什所知，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印饮食差异很大，而且对此非常好奇。“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印度人，我经常被问及和饮食相关的问题，最典型的包括‘所有印度人都吃咖喱吗’‘为什么印度人不吃牛肉’等。”

“对此，我一般简短作答。”

尼泰什说，但这仅是中国人想知道的关于印度问题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所有印度人都会跳舞吗”“印度特别热吧”，甚至“有些印度人为什么不是黑皮肤”之类的问题。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尼泰什结交中国朋友的热情。中国朋友总会在尼泰什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尼泰什认为两国政府应努

“两国人民之间还存在很多误解，有时是因为他们从未接触过对方国家的人。”

来自新德里的尼泰什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流鸿沟。



力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

“我认为中印间仍存在巨大的交流鸿沟。”尼泰什解释道，“两国虽然有很多相似和共通的传统，但却对彼此缺乏了解。”他认为，两国人民之间还存在很多误解，有时是因为他们从未接触过对方国家的人。对此他表示，“中印两国人民应多到对方国家走走看看，了解真实的彼此，而不应仅仅看或听一些片面的新闻。只有加强人员交往，才能真正增进两国间的互相了解。”

在尼泰什看来，如果无法亲身去往对方国家，电影也是增进了解的一个很好途径。“中印作为两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大国，增进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总会使彼此受益。”

戴逸司：爱上中国

“我在中国的生活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自孟买的戴逸司说，“第一个阶段是2012年作为国际关系专业交流生到上海求学，第二个阶段则是2015年在郑州学习汉语。”

然而，求学经历仅仅是戴逸司中国之旅的开始。“我后来决定留在中国，因为我深深爱上了这里的生活。”他说：“我爱这

“一旦你下定决心来到中国，结果一定不会令你失望。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充满变化和发展的时代。”

里的美食、语言、生活方式和人民。”目前，他身兼两职，既是“数字亚洲中心”的互联网社交智库的交流研究协调员，又在一家名为“先锋投资公司”的金融机构担任中国顾问。

因工作需要，他经常往返于孟买、香港和上海之间。“工作上，我找到了一个既刺激又充满挑战的领域，”而中国本身也深深吸引了他。“在这些大城市生活非常有趣，既能体验到发达科技带来的舒适感，又能感受到亚洲不断的变化和特有的活力。”他解释道。

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戴逸司有一系列旅行计划。“北京、上海很棒，成都、武汉、深圳和昆明也很不错。”然而他的旅游计划并没有局限在这几个城市。他表示，

“我还要再去中西部的小城镇看看，从而全面了解广阔而多样的中国。”尽管戴逸司已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但这丝毫没有让他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和好奇消退半分。

对于远在印度的同胞们如何更好地了解中国，戴逸司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其实有很多的渠道和资源，比如书籍、网络媒体、博客、智库和电影。通过这些资源，不管在哪儿都可以关注中国。”此外，他还表示向其他“中国迷”取经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融入印度国内外那些‘关注中国’的群体，其中很多人都有精彩的故事和经历可以分享”。

戴逸司认为，加强中印间沟通的好处其实显而易见。他解释道，“一旦两国在某些领域达成沟通和合作，如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数字融合、互联网金融、城乡人口流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仅会使中印两国彼此受益，还会惠及整个亚洲。”

戴逸司的故事充分说明，一旦你下定决心来到中国，结果一定不会令你失望。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充满变化和发展的时代，而戴逸司恰恰赶上了好时候。

戴逸司喜欢在中国旅行，并从中感受到了亚洲不断的变化和特有的活力。



希夫·库马尔：扎根中国

“当初我来中国是当英语老师，只签了一年的合同。”来自印度哈里亚纳邦的希夫·库马尔说道，“现在十五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这里生活。”

不少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国人都和希夫相似的经历。最初，希夫来到东北，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教英语，因为厌倦了那里漫长的寒冬，希夫搬到了北京，现在他是一名企业培训师。

这份工作给了他充裕的空间来思考中印两国的差异。“对那些进军印度市场的公司，我主要从跨文化的视角开展培训……例如，告诉他们如何在社交场合举止得体，如何在印度做生意，如何与印度商人交往等。”希夫这样解释他目前的工作。

希夫举例子说明中国人和印度人表达情感的方式迥然不同：“中国人讲‘面子’，这个概念在印度文化里是不存在的。”他解释道，“当然，我们也讲究声望，但这和‘面子’是不一样的。开会时，印度人总是乐于表达，而中国人却表现得十分拘谨。这是一种行为举止上的差异。”

希夫同时也指出，不论是印度还是中国，本国内不同地方的差异也很大。“中国这么大，很难一概而论。”他说，“我得承认，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认识很有限。直到现在，我仍然在探索中国，而中国也在不断变化着。印度也是如此——我的家乡在印度北方，虽然我到处旅行，但也无法了解印度的全部。印度南方的很多邦，我从来没去过，那里的语言和文化跟我的家乡完全不一样，即便我们同属于

一个国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市场，中印之间做好顺利沟通至关重要。但希夫说，即使两国商人有意一起做生意，他们却发现彼此很难沟通。“两国在经商方面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喜欢拐弯抹角，话语背后都各自有隐含的意思，没人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心意，翻译中很多意义也会丢失，这让双方感到沮丧，但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似之处。”

在工作中，希夫习惯从差异中寻找相似之处，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当他和中国妻子在教养孩子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们总能最终达成共识。“印度人和中国人都很在乎家庭。”希夫说，“我们或许在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我们都紧紧依偎在家人身边。”

希夫一家的生活展现了中印两国文化的和谐共存。他们庆祝中国的春节，也庆祝印度的排灯节，今天做中餐，明天做印餐，孩子们既说中文又说英文，希夫正在考虑教他们印地语。尽管中国和印度有很多价值观是共通的，但在中国遇到的一些陌生人仍会让希夫感受到误解的存在。

“有些中国人对我非常好奇。”希夫说，“有人以为我来自新疆。当我告诉他们我是印度人，他们便问我会不会唱歌跳舞，问我关于宝莱坞和瑜伽的问题。当然，他们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他们还会问我吃不吃咖喱，可在离开印度之前，我甚至从来没用过‘curry（咖喱）’这个词！”

很明显，中印两国人民还需要增进相互理解。但是，普通的民众如何了解彼此呢？希夫认为，中印两国应该推动旅游业发展。希夫说，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出国旅游，但去彼此国家旅行的却并不多。尽管如此，他认为这种状况即将改变。“我对中印两国现任的领导人很满意。”他说，

“我很看好他们的互动。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尊重、友好、信任，这些都得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

“ 做些功课，耐心准备，带着开放的心态来中国。放下偏见，不要急于下判断。 ”

希夫认为要带着开放的心态来中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体验。



流才能实现。”

那么，希夫对计划来中国的印度人有哪些建议呢？“做些功课，耐心准备，带着开放的心态来中国。放下偏见，不要急于下判断。每个人都能在中国获得不同的体验。这是一个广阔又美丽的国家，这里充满了机遇。”

如果你和希夫有几分相似，或许你来中国之后也会和他一样，比想象中待得更久。

阿努普·莫汉： “跌宕起伏”的中国之旅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13年，公司安排我出差。”阿努普·莫汉说，“在中国，人们的生

活井然有序，基础设施规模庞大，这让我产生了好奇。”最初，阿努普的想法仅是在中国待一阵子而已——但四年后的现在，他成为了北京一家营销公司的全职雇员。

“我和很多想要‘出海’的中国公司，以及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企业合作过。”他说，“从运营社交媒体到寻找相关的商业伙伴，我帮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对阿努普来说，在中国工作是他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说，“在印度的时候，我滑到了底部，来中国后，我冲到了顶上，这感觉很特别。”

这段经历不仅影响了阿努普的职业发展，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这里，我从来没有找到所

谓的‘舒适地带’，我也不曾尝试去寻找。”阿努普说，“这是来中国工作最美妙的地方。这段经历给了我挑战，让我重新定义自己的思维过程、工作方法和交际风格——这一切让我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远远超过我之前的想象。”这些话听起来有些骇人，但阿努普已经战胜了这个挑战。

“在印度，我总能找到自己的‘舒适地带’，轻松应付各种情况。”他解释道，“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却让我开始怀疑自己从前的信念。对我而言，这本身就是最宝贵的礼物。”阿努普明白，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哪怕面对更大的困难，也能找到积极的一面。

“中国总能让人惊喜满满，让你惊讶，让你欢笑，让你沮丧，让你开心，也让你质疑自己。”他说，“生活的终极要义还是更好地了解自己，在中国我完全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地带’，于是我获得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平台。”

阿努普知道，并不是每个印度人都像他一样准备好了才决定来中国。“我去过22个国家，从我的经历来看，中国是遭受误解最多的一个。”他说，“当我和其他印度人聊起中国，他们会说‘你知道1962年的战争吗？’或是‘中国的廉价产品正在蚕食印度市场’，甚至是‘你怎么可以生活在那种国家’等类似的话。”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阿努普并不认同这些观点。

“在我看来，印度人对中国的误解比中国人对印度的误解更深。”他说，“的确，中印两国过去的关系可能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但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中印关系的未来也是全世界关心的话题。“最近，我在美国旧金山遇到了一名商人。”阿努普回忆道，“他告诉我，我已经身处世界经济的中心。他指的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市场和中印两国光明的未来。”阿努普也这样认为。

“对我而言，中国和印度不该是竞争关系，而应该在合作中共同进步。”

“印度人对中国的误解比中国人对印度的误解更深。的确，中印两国过去的关系可能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但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中国工作给阿努普带来挑战，也让他发现了更好的自己。



茶歇时分

文 / Poonam Surie

在阴冷的雾天，没有什么比一杯热茶更能让人神清气爽，也没有什么比与朋友一起悠闲地坐在花园长椅上，手捧一个盛满热茶的库拉杯（一种陶制茶杯，常见于印度北方和巴基斯坦——译者注）的感觉更为惬意的了，茶的温暖透过茶杯，通过双手直抵心窝。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中印两国人民的生活均同茶文化紧密相连。两国都是产茶大国，茶的种类也各具特色。

早在唐宋时期，中国的大街小巷就已经茶馆遍布，达官贵族、商人平民都会光顾茶馆。茶馆既是文人骚客高谈阔论之所，也是人们斡旋调停纷争之地。茶馆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是集中反映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地方。古人

经常把茶叶作为聘礼。《红楼梦》中就有这么一段描写，凤姐对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由此可见古代“吃茶”作为受聘之礼的说法，类似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今，许多茶馆依然存在，有的还提供戏曲、音乐等形式多样的演出活动。

茶具有抗衰老的功效。冬日饮茶可取暖，夏日饮茶能消暑，茶是让人恢复活力的灵丹妙药。

在洛阳白马寺，我曾目睹方丈演示的茶道。在中国各地的寺院都有类似的茶道仪式，茶与佛教寺庙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也可以经常看到有人摆摊卖大碗茶。

北京是一座新鲜事物层出不穷

的城市。一次，在工体路，我碰到了一家卖“奶茶”的饮品店。刚开始，我以为是印度茶来到了中国，结果发现原来它卖的是我们所说的“珍珠奶茶”，茶里有吃起来很有嚼劲的木薯粉小球，看上去就像珍珠一样在茶水里翻滚。

“珍珠奶茶”是以茶为基本原料的一种饮品，如今还衍生出了加入各种水果和花香味道的品种，包括冰沙、奶茶、果汁茶等。这种饮料始见于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不过最近才形成风潮，如今在西方国家也流行了起来。

印度全国各地风情各异，而路边茶摊成为将印度多元文化连接起来的纽带。在德里大大小小的贫民窟和棚户区，人们的心脏随着城市的“音乐”律动，车辆的隆隆声，

不少印度年轻人也喜欢边品茶边工作或阅读。CFP





图为泰米尔女性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采摘茶叶。印度大规模种茶起源于英国殖民时期。CFP

地铁站施工的轰鸣声，街边卖茶人的叫卖声……这里你能听到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声音。印度的街角、政府办公室、大学餐厅，随处可见边喝茶边聊天的人们。小茶厅是人们聊生活、谈政治、论社会的社交场所。呷着茶，吃着咖喱角，多少生意和婚姻大事就敲定了。人头攒动的集市上，卖茶人将盛在铝壶中的茶倒在小玻璃杯中，供来往的行人饮用，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都能看到卖茶人的身影。

如今，茶在年轻人中也流行了起来。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创办了一家名为“茶点”（Chai Point）的公司，用户通过手机APP下单，店家便会送货上门。如今这家公司在班加罗尔和德里已经设立了40个网点，并且正打算将业务拓展到其他邦。

Chaayos也是一家做茶生意的公司，是由几个年轻人在2012年创办的，当时他们就意识到茶正逐渐超越咖啡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这家公司主打定制茶饮，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提供多种多样的风味，如姜和罗勒茶、肉桂茶、陶碗茶、本土茶、绿茶、伯爵茶、柑桔香红茶、

甘菊茶、大吉岭首冲茶、茉莉茶、克什米尔绿茶、玫瑰豆蔻茶、芒果干茶等，并佐以咖喱角、黄油鸡三明治、炸豆饼等各色小吃。

中国的品茶室会将制茶的过程作为一门特别的艺术向大家展示。中国的茶有数百种，有些茶中加入香料、鲜花、果干等，可以起到药用的功效。中国有各式各样的花茶，如菊花茶、牡丹茶、玫瑰茶、茉莉花茶等。游客在品茶馆中能够品尝12到15种茶，直到从中挑出哪种才是最喜欢的。

饮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是神农发现了茶。相传，神农在一棵山茶树下休息，煮水喝时恰巧有几片山茶树的叶子落入水中，水便变了颜色。饮其水，神农立感精神百倍。从此，茶叶开始在中国广泛种植，饮茶的习惯甚至逐渐影响了整个世界。在中国，茶既可以用在一些仪式上，也可以作为药用。当茶上升为茶道，制茶也就有了社交的意义。茶同佛教寺庙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传，来自印度的达摩祖师将禅宗引进中国，他落脚在中国嵩山，也就是现在少林寺所在地。达摩曾面壁九年而不睡，

中间有一次他不小心睡着了，懊恼之下，达摩割下眼皮扔掉，扔在地上的眼皮就地长成了茶树。后来，僧人们就靠喝茶来保持清醒。唐代茶学家陆羽在《茶经》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茶的种植、烘焙、分类以及饮茶的风俗习惯等。宋朝流行的喝茶方式，是将茶饼碾碎，将粉面状的茶末放入滚水中搅拌冲泡。但是元代以后受异域的影响，这种泡茶方式不复存在，人们喝茶变成了冲泡茶叶，这种喝茶方式一直沿用至今。17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制茶方法，例如乌龙茶就是用晒干的茶树茶叶制作的一种半发酵茶。

印度饮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年。但是大规模种茶的历史起源于英国殖民时期。英国人从中国购买大量的茶叶，为印度大规模种茶打下了基础。1774年，沃伦·黑斯廷斯（第一位实际意义上的印度总督，1773年至1785年间在职）将茶籽从中国带到印度北部，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也建议在印度种植茶树。但是在1823年，人们在阿萨姆邦发现了印度的本土茶树，它们是中国茶树的变种。由于水土不服，中国引进的茶苗没能在阿萨姆邦存活下来，因此印度决定种植自己的茶叶品种。

1835年，大吉岭被划归到东印度公司管辖，人们发现中国的茶籽在大吉岭能够存活，于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商业种植。大吉岭和阿萨姆邦的成功模式被印度其他地区复制，包括喜马拉雅山山麓等地区纷纷开始茶叶种植。1947年之后，茶叶种植持续兴旺，直到现在，印度很多地区仍都有茶园。

中印两国人民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但是神奇的茶却能带给他们同样的舒畅与活力。

本文作者 Poonam Surie 是印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曾经在中国生活，著有《中国：灵魂的探求》《中国：孔子的影子》和诗集《月光上的舞蹈》。



印度的力量和弱点

文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一个国家的民族自信来源于其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尼赫鲁对印度的历史进行重新阐释，恢复了印度人的自信。不仅如此，他还以真挚情感与优美笔调描述了印度的历史、文化、哲学、艺术，重新唤起了印度人的文化自觉和身份意识。

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本书是尼赫鲁于1944年5月至9月在狱中写就的关于印度往昔、现状和未来的经典名著。尼赫鲁从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诸方面追溯了古代到中世纪的印度悠久历史，生动描绘了印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他冷静地回顾了近代印度壮阔的民族解放历程，并且热切而又不失理性地展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民族命运。

要研究印度的力量和弱点以及它退化和衰败的根源，是长时期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事。但它衰败的近因是显而易见的。印度在技术的进展上落后，而欧洲，虽然有许多方面是长期落后，但在技术方面则确是带头。在技术进步的背后，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与活泼的生命和气魄，表现在许多活动和关于发现的冒险旅程中。新的技术使西欧许多国家得到军事力量，所以它们易于向东方发展并支配东方。这不仅对于印度是如此，而且差不多对于整个亚洲也是如此。

何以会造成这种局面，对印度来说是更难解释的，因为印度在古代并不缺乏灵敏的智力和专门的技巧。我们感觉到这些都是在近千百年内逐渐地衰退的。生活的要求和努力渐渐减少，创造精神随之消失，只在模仿上用功夫。在胜利的而且有反抗性的思想曾经企图洞穿大自然和宇宙的秘密的经典中，咬文嚼字的注释家只在注释词句和冗长的解说上着力。壮丽的艺术和雕刻为精细琐碎的小品所代替，高尚的想象和设计都消失了。精神饱满的语言，原本既有力量而又简明，反而演变成极为华丽和繁复的文体。冒险的推动力和丰满有余的生活所促成的大规模向远处移民以及传布印度文化，都已消失了，而狭隘的正统甚至于禁止了人民渡海。在古代曾显著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本可能领导科学前进，而现在

也被那无理性的和盲目的崇拜偶像所代替。印度的生活成了呆滞的河流，一直存在于旧时代中，疲缓地经过了许多毫无生气的世纪。他们为旧时代重大的负担所压迫而陷于类似昏迷沉醉之中。在这种智力迷失而体质衰弱的状态之下，无怪乎正当其他国家都在迈步前进之中，印度反退化而停滞不前了。

然而这不是完整或全面正确的观察。假使真的是一个长时期的僵滞不进，那就可能导致一个大变迁，与旧时代完全中断，旧时代死去而新时代在它的废墟上生长起来。但我们并没有过这样的变迁而且明明还是照样继续下去。有时也有复兴的活跃时期出现，而且有些是光辉的，相当长久的。在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种企图去认识和运用新的事物要使其与旧的融合，或是至少与那旧的之中他们认为值得保留的部分融合。有时旧的东西只保留外部形式，成为一种标志，而换了新的内容。但是生气勃勃的精神仍然存在，有一种要求促使人们趋于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但是总存着那综合新旧的愿望。就是这种要求和愿望才能使得人们前进，并且使他们在保留旧思想之中接受新知识。这么多年来是不是有一种像人们所说的“印度梦”，它或者是精神饱满的，或是睡梦中迷迷糊糊的，我可不知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于它的国家命运都有这样的信心或幻想，这种说法总有一部分正

确的。因为既是印度人，所以我自己也受了这个信心和幻想的影响，并且我觉得任何民族如果它能度过几百个世代而毫不间断，一定有其吸取耐久力量的源泉，而且还有能力把这力量随着时代更新。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力量的源泉呢？如果有的，是不是已经干涸了，或是还有地下的泉水可以把它补充起来？今天怎么样呢？是不是又有任何泉水使我们能够恢复和加强呢？我们是一个古老的种族，或是更正确一点说，是多种混合的种族，有史以来就有我们这个种族。我们是不是已经过了盛时而现在到了日暮穷途的时候，只能勉强支持那老年的无声无臭的、无生气、无创造性的生活，只希望安逸和睡眠，其他一切都不去管呢？

从来没有永远不变的民族和种族。它是接连不断和其他种族相掺杂而慢慢地改变的；它好像死了而又复活为新的民族，或是成为老的变相。也可能新旧之间有一个明确的中断，而思想与理想的重要链环也可能把他们连接起来。

我们观察历史中有许多古老而成熟的文化慢慢地或是忽然被消灭，而由活泼的新文化继承下去。这岂不是一种活泼的潜在力也即是力量的内在源泉，使文化和人民得到新生命么？如果没有这种力量，所有的努力岂不都是枉然，就像一个老年人幻想要变成青年人一样吗？

现在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我觉得拥有这种活泼的潜在力的民族主要是三个——美国人、俄国人及中国人，这三个民族相提并论是古怪的！美国人虽然根本是旧大陆的人，但已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因此不难了解他们丰富的生活力。如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毅然决然离开旧世界而到新环境中去求新生活的。

俄国人也不是新的民族，但他们对旧时代完全中断，像死了一样，他们史无前例地复活起来了。他们变得年轻而且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他们也在重新搜寻他们的老根，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新民

族、新种族和新文化。

俄国人的榜样启示我们一个民族如何能够返老还童，只要它肯付相当的代价去民众里开发被压抑的泉源。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虽然使人遭受恐怖和灾难，可是也许能使战后余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复兴。

中国和他们情形不同，中国人不是一个新种族，也没有经过像俄国那样从上至下惊天动地的转变。然而七年的残酷战争无疑地也把他们改变了，这是势所必至的。中国所受战争的或其他更深的的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我不知道，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中国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富有基本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的。

我在中国人中所看到的某些生活力，我觉得印度人中也是有的。但也不敢说经常地都有，无论如何，要我用客观态度去观察也是困难的。也许我的愿望将我的想法歪曲了，然而我在印度人群中总是一直在寻找这种力量。如果他们有这样生活力，那好极了，他们一定会有好的表现。如果完全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一切的政治努力和呼声都是自欺欺人，枉费心机了。我没有兴趣达成一个政治协议，使我国人民多少照旧生活，而只稍有改善。我认为他们蕴藏的大量的生活力和能力被遏抑着，我要把这些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觉得年富力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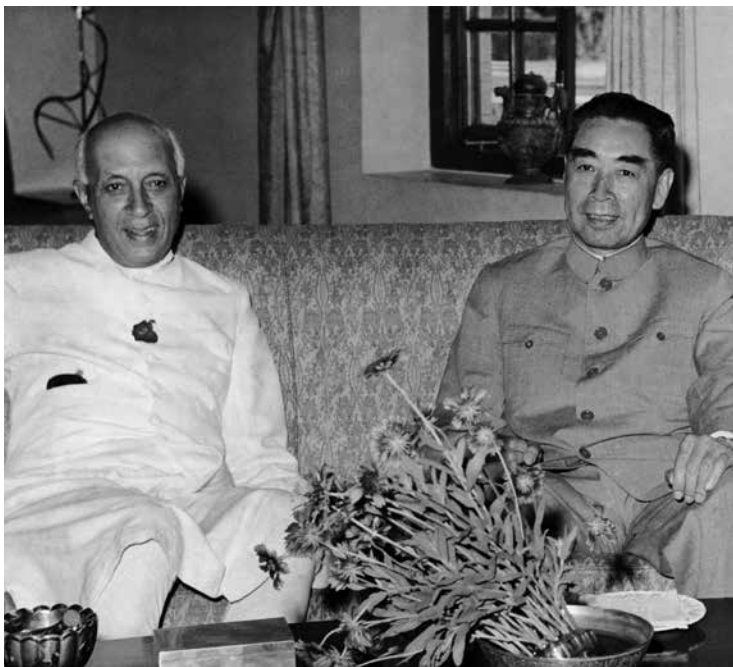
印度的多种多样性是惊人的，这很明显，它是摆在表面上，谁都看得见的。这和身体的外貌以及某些精神上的习性和特征都是有关的。西北的帕坦人和在极南的坦密耳人之间在外表上就少有共同之点。他们的种族世系是不相同的，虽然他们或许有共同的血统关系；他们在面貌上、身材上、饮食上、衣服上，而且当然，还有在语言上，都是不相同的。在西北边省那

里已经有中亚的气息，并且有许多习惯，比方说在克什米尔，就使人想到喜马拉雅山那边的一些国家。帕坦的民间舞蹈就特别像俄国哈萨克的舞蹈。虽然有这些种种的不同，在帕坦人和在坦密耳人身上都无疑地显然具有印度的特征。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正如阿富汗也是一样，因为这些疆土曾经和印度联合过几千年之久。住在阿富汗和中亚细亚的某些地方的古代土耳其和其他民族在伊斯兰教未来临以前，他们大部分是佛教徒，在更早以前，当史诗时代，则是印度教徒。边疆地区是古印度文化主要中心之一，它还充满了古文物和宇宙的遗迹，特别是又始罗（Taxila）大学，它在两千年前有崇高的声望，吸引着印度各地方及亚洲各部分的学生。宗教上的更迭使它有些影响，但是它不能够完全改变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逐渐成长的精神上的背景。

帕坦人和坦密耳人是两个极端的范例；其他的大都处于这两者之间。他们都有他们的特殊形态，他们都具有更显著的印度的特征。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发现孟加拉人、马拉塔人、古甲拉特人、坦密耳人、安度罗人、奥理雅人、阿萨密人、卡那列人、马来雅拉人、信德人、旁遮普人、帕坦人、克什米尔人、拉其普特人和广大中央地带包括讲

2014年11月17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国大党举办为期两天的国际会议，纪念尼赫鲁诞辰125周年。CFP





1960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新德里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会谈。CFP

印度话的人也在内，是这样地保留着他们独有的特性达数百年之久，多少还存着传说和记载中告诉我们的美德和缺点，但是过了这些年代仍然很明显的是他们是印度人，还具有同样的民族传统，以及同样一套的道德和精神特质。这个传统有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图为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左一）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三）、缅甸总理吴努（左四）交谈。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



一种活泼有力的东西，表现在生活和对人生的哲学态度方面及其他问题上。古代印度，像古代中国一样，自成一个世界，它本身就是形成一切事物的一种文化和文明。外国的势力灌输进来常常影响了这个文化而又被它同化了。分裂的趋向立刻会引起综合的企图。从文明的黎明期起，印度的心中就有一种一致性的梦想。这不是当作外力强加进来要使外表甚至于信仰都变标准化的一致性，而是更深远的东西。在它的范围里，对于信仰和习俗都采取了最宽容的态度，而且各式各样的信仰和习俗都受到承认和鼓励。

在一个民族集团里，无论它内部如何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它们的意见分歧或大或小是都可以发觉出来的。虽然两个相邻集团之间的分歧在边界上往往会消失或是混合起来，而且近代的发展在各方面会促成相当程度的划一，把它同另一个民族集团比较，这个集团的基本一致性就会表现出来。在上古及中古时代，现代式国家的观念是不存

在的，封建、宗教、民族和文化的关系更为重要。但是我想差不多在历史任何时期的记载中，一个印度人在印度的任何地方会多多少少地觉得自由自在，而他在别国总会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或异国人。但若那国家接受了他一部分的文化或宗教，他就不会觉得那样陌生了。那些信仰产生于印度以外的宗教的教徒的人，来到印度而定居下来的人，几代以后就变成显著的印度人，例如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祆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等人都是的。改信了某些这种宗教的印度人，并不因为他们信仰的改变就不是印度人了。他们在别国，尽管与当地人彼此之间或许有共同的信仰，也会被看作是印度人或外国人。

当民族主义的观念更加发达的今天，在国外的印度人为了各种的目的无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民族的集团，无论他们内部有怎样的分歧。一个印度的基督教徒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被看作是一个印度人。一个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在土耳其、阿拉伯或伊朗或其他伊斯兰教最有势力的地方也被看作是一个印度人。

我想我们大家对于本土都有不同的印象，但没有两个人会想得一模一样。当我想到印度，我就想到下面的许多东西：它的广大土地上遍布了数不尽的小乡村；我所到过的市镇和城市；变幻无常的雨季，它把生命倾泻于焦干的土地里，忽然间把它转变为闪耀的广大美境和绿野，长江大河和流水；荒凉环境中的开伯尔隘口；印度的南端；个别的人和成群的人；尤其是巅峰积雪的喜马拉雅山或克什米尔的一些高山溪谷，其中春天开满了鲜花并有一条溪流奔腾而汨汨地从中穿过。我们心中想出并且保存的是我们自己所爱好的图画，所以我选择这个山岳背景，而不要那一般的炎热的亚热带地方。这两种的图画都可算是正确的，因为印度是由热带一直伸展到温带，由赤道附近伸展到亚洲寒冷的腹地的。图

（以上选自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和第六节。）



沟通中印



关注我们的
多媒体平台



联系我们: contact@chinaindiadialogue.com

WWW.CHINAINDIADIALOGUE.COM



中国西塘古镇
XITANG HISTORIC TOWN OF CHINA

生活着的千年古镇——西塘

A living ancient town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 Xitang

